

在「祖國」與「外國」之間： 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

藍佩嘉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吳伊凡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本文針對在中國大陸就讀高等教育的台灣學生，探討遷移經驗如何影響國族認同的形構與轉變。透過 61 份深入訪談資料，闡釋旅中台生如何在台灣與中國、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祖國」與「外國」之間交織而成的論述網絡裡，磋商其曖昧的主體位置，以及如何在日常互動中，指認我群與他群的差異，並透過各種生活實作，模糊或強化我群與當地人的界線。本文用畫界工作的概念來分析台生的磋商與行動策略，並提出座標圖的工具來分析台生內部的異質經驗，研究發現三種主要類型的畫界工作策略：(1)傾向畢業後不留在中國工作，強調台灣人與當地人之間的差異，常見於學位導向的台生。(2)傾向畢業後留在中國，或納入在地社會程度較高者，如部分專業移民子女與尋求本地謀職的台生。(3)多數人希望留在當地工作，但在地理空間與社會生活上，都維持與本地人明確的區隔，如聚落台商子女與尋求跨區生涯流動者。

關鍵詞：學生遷移、畫界工作、認同、國族認同、兩岸關係

Between "Homeland" and "Foreign Country": Liminal Identity and Boundary Work of Taiwanese Students in China

Pei-Chia L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i-Fan Wu

Master of Arts,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ased on 61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aiwanese students who moved to China for higher education, our study examines how migratory experience impacts the configu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n particular, we explore how migrant students negotiate their ambiguous subject positions in webs of discourses that are interwove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between China-as-imagined and China-in-reality, and between "homeland" and "foreign country." We demonstrate how students re-identify "us" and "them" during personal encounters while living in China, and how they utilize a variety of everyday practices to highlight or downpla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locals. We propose a map of boundary work to analyze migrants' heterogeneous positions and multifarious experiences. We identify three major types of boundary work, as follows: (1) Some students are inclined to leave China after graduation and emphasize the existence of rad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aiwanese; this strategy is most common among those who emigrated to study for degrees. (2) Some students are inclined to stay in China and becom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 to a higher degree, such as those whose parents work in China as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who came to China for job prospects. (3) The others choose to stay in China but highligh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locals by deploying spatial and social segregation; examples include those whose parents run businesses in China and those who seek cross-region employment and mobility.

Keywords: student migration, boundary work,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Taiwan and China

你當然心裡殘留著以前那種教育的印象，比如說神州大陸，我又是受古典文學薰陶長大的，我心裡當然是充滿那種，偉大的歷史啊。所以我剛下飛機，在上面看到那個土地的時候，就覺得超感動，祖國耶。那下來以後你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其實，就跟外國一樣。（小沈，赴中國就讀中文所博士班）

我覺得，我們[台生]是夾心餅乾，台灣人對你有誤解，但是真正在那邊生活，那邊的人也不知道……。我自己覺得有一點像當初去美國的那一代。你去美國，大家都很清楚那是不同的地方，可是，到大陸，人家會覺得好像是同一個地方，可是實際上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地方，那感覺更詭異。（小莉，赴中國取得商學院碩士）

近二十年來，穿梭在兩岸之間，除了追逐龐大商機或廉價勞力的台商、隨工作機會而流的台幹與專業移民，還有一群前往中國就讀大學或研究所的台灣學生（以下簡稱「台生」）。中國政府基於政治考量，不僅在學費、福利上給予台生等同本地學生的待遇，也為台生開放了比本地學生或外國學生更優惠、便捷的招生管道。隨著國民黨政府上台，台灣開放中國學歷認證逐步露出曙光，旅中台生的數量也有著日漸成長的趨勢。

本文的關切在於，旅中台生的遷移經驗如何影響其國族認同的再形構。留學是一個文化接觸的沃壤，異地生活提供了一面認同之鏡，讓遷移主體透過與文化他者的互動，來指認差異、重新定位自己。和一般留學生不同的是，基於兩岸關係的歷史連結與政治對立，旅中台生的主體位置更為複雜曖昧。台灣人移居中國時不是拿護照進入「外國」，海峽兩岸也經常被假定有著「同文同種」的高度相似性，甚者，在國民黨的傳統思想教育或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工程裡，中國還被定位成台灣人的「祖國」。

如文首的兩段引言生動點出，台生的主體位置，座落於台灣與中

國之間、「祖國」與「外國」之間、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之間交織而成的論述網絡，其中蘊含多重矛盾的論述位置，讓台生置身於曖昧過渡的中介之闕。本文試圖深入了解台生在中國的遷移經驗，分析其中無所不在與持續不斷的文化接觸機會，如何讓台生「重新指認自我與他者」，以及「重新定位台灣和中國」。¹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概念

（一）遷移與認同形構

遷移經驗如何影響認同的形構(formation)與轉變(transformation)，一直是遷移社會學關切的焦點。早期研究採同化(assimilation)的觀點，視遷移經驗為線性的變化過程，移民將逐步融入移居地的生活方式、內化新國家的文化價值與行為態度，進而失去原有的族群印記與文化差異。同化觀點在 1980 年代後受到強烈批判，不僅因為政治不正確的文化霸權立場，更因為「大熔爐」的現象事實上並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認可文化差異的多元觀點，強調少數族裔在移民後仍能保存其文化獨特性，促成多元文化的「沙拉碗」。

1990 年代中期後，美國人類學者提出「跨國狀態」(transnationalism)²的概念，來描述一種新的移民生活型態。Nina Glick Schiller 等(1995)用「跨國民」(transmigrant)的概念來區分於傳統的「移民」(immigrant)，前者雖然移居到新的國家，仍與母國維持緊密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連帶，進行彈性流動的跨國度生活。該派學者也強調，研究者必須跳脫「方法論上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1 多數受訪者用「大陸」這個無論對共產黨或國民黨政權來說都比較「政治正確」的字眼來描述中國。在描述人群時，常使用「大陸人」的說法，或用比較模糊的稱謂，如「本地人」、「對岸的人」、「這邊的人」；但在描述政府或國家時，則多使用「中國政府」、「中國」的說法。受訪者中較傾向求異、綠或獨的政治立場者，較傾向使用「中國」、「中國人」等字眼。本文的行文（不包括引用當事人話語）為求精確，一律以「中國」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人民與統治領土。

2 "transnationalism"在台灣學界過去多被翻譯為「跨國主義」，我們認為並不適當，這裡的"ism"指的應是存在的狀態(condition of being) (Waldinger 2008: 5)，而非思想主張。

nationalism)的分析框架，若是根據單一忠誠、線性同化來界定的狹隘民族認同模式，將無法理解「跨國民」多重、混雜(hybrid)或流動(fluid)的認同樣態(Wimmer and Schiller 2002)。

然而，也有學者質疑「跨國狀態」在現實中並不如論者所說的如此普遍，如 Alejandro Portes (2003)認為符合「跨國民」樣態的主要是具有高等教育、豐富社會人脈的一小群已婚男性遷移者。Roger Waldinger (2008)則認為不應把「跨國狀態」視為一種獨特的樣態，或把「跨國民」看成一個獨特的人群，他主張，遷移者在移出國與移居國之間進行連結，如匯款與探親，本來就是一些持續發生的活動，研究者應該分析有那些制度與結構因素阻礙了遷移者在兩地之間延續進行連結。例如，移居國的入籍政策的限制，可能讓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難以返鄉探親，或者，隨著親人團聚，移民會逐漸削弱與母國社會的連結。

Roger Waldinger 與 David Fitzgerald (2004)在另文中更鮮明地指出，把「同化」與「跨國狀態」視為兩種對立的觀點，其實是誤導的看法。他們主張，「同化」指的不只是族群差異的消失，也指涉國族差異的重新建構。同樣地，「跨國狀態」也沒有超越或消弭族群或國族的差異，與「同化」現象一般，兩者都不是普遍的趨勢，而是歷史化的獨特樣態。研究者需要分析的是，遷移者與移出地、移居地的國家以及公民社會的互動，如何形構了其在兩地之間的生活經驗與認同歸屬。

除了國家制度的限制，移居國的公民社會如何看待移民，對於移民的認同形構也有重要的影響。一個很有趣的相關案例是到日本打工的日裔巴西人。種族同質性高的日本社會，雖然有缺工需求，卻對外籍勞工的引進戒慎恐懼，因此，政府採取折衷之計，招募種族同源的日裔巴西人(nikkeijin)。但這些日裔巴西人多為數代移民，對於日本語言與文化都很陌生。雖然他們在巴西時以日本人自居，並強調與非日裔巴西人之間的族群與文化差異，真正到了日本，卻因為階級位置而遭受日本民衆歧視，也經常面臨同化壓力而被指責行為舉止「不像日

本人」。日裔巴西人的回應方式，則是重新形構其巴西認同，如同一位當事人所說：「我們來日本找錢，卻找到了我們的巴西性(Brazilianness)！」(Tsuda 2000: 56)。透過學森巴舞、說葡萄牙話等有意識的文化展演，他們形成新的族群「反抗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

日裔巴西人座落在一個「介於本地人與外國人之間的中介空間(liminal space)」(Tsuda 2011: 59)。到中國工作的新加坡華人專業者，有著類似的族群曖昧位置，但階級位置截然不同，根據 Brenda Yeoh 與 Katie Willis (2005)的研究，許多到中國工作的新加坡人，懷抱著返鄉尋根、親炙中華文化的心情，期待「活化他們『失落』或『被壓抑』的華人性(Chineseness)」，但在現實的人群接觸中，他們經常感到失望，從而強化自己的新加坡認同，以和中國人區分開來。一位受訪者這麼說：「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Chinese in China)³非常不一樣，我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被膚色騙了」。他們用遷移敘事來劃分界線：「幸運的是我們的祖先離開了這個地方，否則我們就會變成他們的一分子！」(Yeoh and Willis 2005: 275) (原文為英文，由作者翻譯)。

綜合以上，我們主張，「同化」或「跨國狀態」都不是普遍的趨勢，而是歷史化的獨特樣態。不同的移民群體，面對不同的移民政治、公民身分制度，以及與移居國人群的互動，會衍生不同的方式來協商國族或族群的界線與認同。本文將進一步透過座標圖的分析工具，來討論座落在不同社會位置的台生如何衍生不同類型的畫界工作（詳見後文圖二）。在此我們先說明構成座標圖的兩個軸線，分別是遷移軌跡的光譜（留或不留），以及認同形構的光譜（求同或求異）。

遷移者之間的異質性，可以透過遷移軌跡的光譜來定位其相對位

3 由於「華人」的說法是指中國境外的華裔族群，在中文語境中，不宜將"Chinese in China" 稱為「中國華人」，故翻譯為「中國人」。我們感謝《台灣社會學》編委會的指正。

置，一端是短期居留、無意生根的暫居者(sojourner)，另一端是離開家鄉到異地落腳生根的移民(immigrant)，中間則是以不同程度和方式與兩地維持連帶的跨國民(transmigrant)。同樣地，關於遷移者的認同形構，我們也主張用光譜的方式來看待遷移者如何看待自我／我群與移居國人群之間的族群或國族差異，一端是同化(assimilation)，傾向融入、淡化差異，另一端是分化(differentiation)，傾向區分、凸顯界線，中間則是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協商我群與他群之間差異的混雜認同或流動認同。

(二) 兩岸遷移與國族認同

那麼，旅中台灣人或兩岸遷移的個案，具有怎樣的歷史獨特性？我們認為有以下主要兩點。首先，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特殊化的國際關係，雙方雖為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卻彼此宣稱對方為自身主權的統治範圍，因而使得規範兩岸遷移的相關制度具有既非「國際遷移」又非「國內遷移」的曖昧特色。曾嬾芬、吳介民(2010)分析中國管理台灣移居者的政策時指出，「台灣地區居民」是中國官方範疇中的一個特殊身分團體，是一種既非一般「中國公民」、也非一般「外國人」的「境外人士」，其地位較接近國民(nationals)，而非公民(citizens)。

曾嬾芬、吳介民(2010)發現，中國政府近年來對於台灣人的居留權與就業權雖然採取寬鬆而籠絡的「準國民待遇」，然而，台灣人若想要在中國「落戶」、「定居」仍相當困難。兩岸關係中相對弱勢的台灣政府，則採取母國認同政策，不接受雙重戶籍，但為了籠絡移居者的支持，對於其旅居中國時是否能享有台灣的社會福利（如健保）仍採取寬鬆的認定。這樣的政策框架，使得旅中台灣人，並沒放棄台灣公民身分的誘因，在當地也沒有入籍的壓力，得以維持雙重身分，並享有兩岸制度所創造出來的雙重利益。

其次，兩岸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與政治對立，加上台灣內部

不同族群在歷史經驗上的差異，使得「國族認同」⁴ 在台灣一直是個具有高度敏感與多重指涉的問題。民意調查多半使用以下問法來探詢：「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或者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不同單位執行的調查往往呈現不一致的結果，除了抽樣方法造成的偏誤，也因為問法的差異造成不同的提示效果。尤其，「中國人」究竟是一個族群／文化上的疆界（如「華人」、「中華文化」），或是政治／領土的疆界（「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氛圍，乃至於對於不同的世代人群來說，都指涉了不同的意義。近年的調查結果也顯示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馬政府執政時期，兩岸關係和緩、互動也更為頻繁，然而，「台灣人」的認同比例卻不減反增。⁵ 我們認為，要深入探究以上貌似矛盾的認同趨勢，必須跳脫「中國人」、「台灣人」的二元範疇區分，進而透過質性資料，將國族認同的界線形構放在歷史化的論述脈絡，以及具體的日常互動經驗中來理解。

有關旅中台灣移民的社會學研究，主要以台商與台幹為研究對象。鄧建邦研究珠三角台商與大陸員工之間的接觸，引用德國社會學界的「陌生」概念，強調「陌生」不是一種固有的特性，而是關係性的相對界定；尤其重要的是，「陌生之所以為陌生，並不是彼此互不類屬而區分出來，而是首先存在一假定的、或實際上的關係」（鄧建邦 2002: 215）。以此來看，台商與大陸員工之間存在親近與差異共存

4 「台灣人／中國人」的疆界究竟是一個族群認同、民族認同、國族認同，還是國家認同？這個問題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定位，值得另行研究。本文折衷地使用常見的「國族認同」一詞，即便此概念的含義在學理上不甚精確，但或許正符合了台灣現實中俗民分類的曖昧性。基本上，「國族認同」對應的是英文的"national identity"一詞，其翻譯是一個眾所皆知的困難問題（汪宏倫 2001）。「國族認同」的中譯，容易混淆民族認同與國家(state)效忠，吳乃德(2005)因此建議翻譯為「民族認同」。然而，多數受訪者並不會同意將台灣人、中國人視為不同的「民族」，而單純視為「族群認同」，又化約了「台灣人／中國人」疆界中所具有的政治意義與效果。然則，要說明的是，本文處理的不是狹義的「國家認同」的問題，如許多台灣的相關社會調查實證研究，以政治與領土層面的「統一／獨立」問題來測量「國家認同」。

5 例如，政治大學於 2008 年執行的民調數據顯示，在「不提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前提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高達 72%、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則有 16%。在「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前提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為 49%、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 3%，認同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則為 44%（陳思豪 2011）。

的關係，不僅因為彼此在廠場中有空間上的緊密相連與生產上的依賴關係，也因為雙方被假定具有「同文同種」、語言相通等文化親近性，更凸顯彼此之間普遍存在溝通不足、歧視與不信任的陌生感。

鄧建邦(2009)也用跨國觀點來探究台商家庭的多重生活空間與認同交界域，用「生活在兩個社會的陌生感」、「生活在兩個社會的雙重認同」等描述來彰顯台商的曖昧主體位置。我們認為，這些研究提供了對台灣移民之認同形構的初步考察，但因為台商的階級位置、其與中國員工的互動關係，無可避免地混淆了族群區隔與階級支配的雙重界線。此外，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考察其中行動者的異質性，並且動態地檢視認同隨著遷移軌跡嬗遞的變化。

汪宏倫(Wang 2009)考察較近期的台灣人移居上海現象。台灣人的「上海熱」，映現「中國崛起」的歷史場景中，台灣移民嚮往上海作為全球城市的國際化都會風貌。然則，汪文也指出台灣移民在全球化與國族化(nationalization)之間的困境，對於中國與台灣在政經力量上的相對傾斜充滿集體焦慮。台灣移民的生活方式選擇，被迫夾在「兩個競爭、對立的民族國家的縫隙中」(Wang 2009: 336)，安排子女教育等決定都不可避免地與公民身分、政治忠誠、族群認同糾結在一起。

沈秀華(Shen 2005)觀照兩岸遷移連帶中的親密關係與性別政治，透過蒐集台灣媒體與出版的論述、大老婆的話語，來分析「中國二奶」如何被台灣社會負面再現。我們認為，其中涉及的他者化過程是一個相互映照的鏡像過程，不只是「中國女人」如何被台灣社會再現，也包括「台灣男人」如何被中國社會所建構。因此，本文的分析將試圖分析相互指認的論述脈絡，以更確切地掌握其中他者化的邏輯。

黃淑鈴(Huang 2010)從傳播媒介的使用經驗來探討旅中台灣人的認同。她發現，無論受訪者用什麼方式來描述自己的遷移，⁶ 他們都

6 黃淑鈴請受訪者指認以下七個名詞何者較適合描述自己在中國的情境，其中大多數人使用「過客」、「異鄉人」，其次為「候鳥」、「游牧民族」，最少數使用「移民」、「歸鄉人」、「落戶」。

仍與台灣維持密切的聯繫，並普遍抱持著「暫居者」(sojourner)的心態來抗拒在當地「同化」，然則現實的狀況是，他們的事業與工作極可能使他們處於一種曾熾芬所說的「永久暫時」(permanently temporary) (Tseng 2005)的遷移狀態。黃將旅中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區分成三大類，除了持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以中國人爲主要認同，其餘多數採取「彈性認同」(flexible identities)，或者，基於工具主義的考量，視政治情勢來調整自己的認同，如認爲統一是不可以避免的未來而定位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採取多層次的國族認同，視關聯的對象或情境而有不同指認方式。

黃淑鈴(Huang 2010)的研究提供了許多豐富的資料與精彩的分析，堪稱目前相關文獻中最深入的研究。她注意到了旅中台灣人內部的異質性，也敏銳地觀察到國族認同是情境式、脈絡化的指認，但尚未解釋這些異質性的成因，或進一步討論是怎樣的脈絡與情境影響人們衍生不同的指認方式。此外，黃所區分的三類國族認同，與其說是三個明確的範疇，其實更接近光譜式的分布。基此，我們希望透過座標圖的方式來呈現遷移軌跡的異質分布、國族認同的差異形構，以及兩者的交錯構築下，如何形塑遷移者在日常生活中，採取不同的畫界工作策略來協商界線與認同。

目前，除了少數初探性短文（如：林平 2010），尚未出現深入探討台生遷移的研究，尤其針對其認同形構的影響。我們認爲，在三個意義上，這個課題具有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首先，不像一般留學生主要爲了學位而來，台生的遷移動機很多元，混合了家庭引導、工作取向、教育遷移等不同型態。其中許多台生是台商或台幹的子女，或希望透過求學的入門磚，幫助自己成爲未來的投資移民或專業移民。所以，雖然留學只是短期移居，仍適合從遷移的角度來檢視其中的文化接觸。其次，不像台商與當地人的互動多混雜階級（員工）或性別（二奶）的支配關係，台生的互動對象主要是相對平等的中國同學與朋友，這使得台生個案，更適合作爲台灣人與當地人接觸的縮影。最後，多數台生出生於 1980 年代，這個年輕的台灣人世代，在近年的

調查中普遍顯示較高的「台灣人」認同傾向。⁷ 這樣的狀況在經歷中國居留的經驗後會產生怎樣的變化？族群背景的影響是否仍然顯著？兩岸之間日益頻繁的交流互動，如何影響年輕一代台灣人的認同形構，勢將影響台灣的國族政治與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

（三）指認與畫界工作

要如何深入探討國族認同的轉變與磋商？本文透過指認(identification)與畫界工作(boundary work)等理論概念，來超越既有旅中台灣人文獻的不足，以及深化遷移文獻中有關認同形構的討論。

近來的文化研究與社會學文獻爲了避免將「認同」(identity)化約爲靜態的身分範疇，轉爲分析「指認」(identification)的歷史動態過程。有別於「認同」作爲名詞所蘊涵的本質主義或自然主義的傾向，「指認」作爲動詞強調的是，行動者如何在特定的脈絡與情境中指認出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性的差異(Brubaker and Cooper 2000)。Stuart Hall (1996)進一步說明，指認的過程凸顯出：其一，認同是經由差異(through differences)而建構出來的；自我或我群的定位，必須透過指認以及排除他者或他群來形成；人們要定位「我是誰」，必須透過辨識「我不是誰」。其二，認同是建構在論述之中(within discourses)，我們必須分析是怎樣的論述脈絡召喚(interpellate)或呼叫(hail)行動者進入特定的主體位置。換言之，人們在定位自己與指認他者時，仰賴且受限於既有的論述脈絡，人們的能動性展現在如何挪用、拼湊不同論述中的元素，也就是接合(articulate)與縫合(suture)的過程。

Andreas Glaeser (2000)的民族誌提供了一個「指認」的研究範例。他在德國統一後觀察駐守在同一警局裡的來自東柏林與西柏林的警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透過空間、時間的閱讀、使用與配置來指認我群與他群的界線，並使用不同的敘事劇碼，來詮釋彼此的差異。

7 根據天下雜誌(2009)的民調，受訪者中有 62%指認自己是「台灣人」，認爲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爲 22%，回答「中國人」者僅有 8%。在 18 到 29 歲的年輕受訪者中，則有約 75%的人認爲自己是「台灣人」。

Glaeser (2000: 11)的研究問題是：「指認的方式在跨越時間與社會情境之際會有怎樣的持續性(durability)或可變性(mutability)」，而「認同」便是這個持續進行過程中的瞬間快照。

我們呼應前述學者，強調指認差異的行動座落於(situated)特定的論述脈絡。基此，本文先分析「台灣人」是如何被中國民衆所看待，或者說，被論述性地建構。由於本研究的資料蒐集範圍，未及於訪談中國民衆，這部分的資料僅能依賴台生的訪談；換言之，這些資料並非直接呈現中國民衆對於台灣人的看法，而是透過台生之眼的折射。然而，我們認為，這樣的資料侷限並未對本文的論證構成太大影響，因為，我們關注的是台生感受到被怎樣的論述所召喚、進入怎樣的主體位置，也就是台生所體驗到我群如何被他群所看待的方式，而不是中國民衆究竟如何看待台灣人。在此基礎上，我們進而分析台生如何指認台灣人與當地人的差異與界線。我們將分析台生如何挪用、剪裁、拼貼不同的論述(discourse)，包括發展主義、國族主義、「中國崛起」、「素質」等論述，來輔助個人建立有關差異與認同的敘事(narrative)。⁸

我們對認同形構的分析，除了論述與敘事的層次，並借重「畫界工作」的概念，延伸到互動與實作的層次。畫界工作指的是「人們用來創造、維持與修正文化分類的策略、原則與實作」(Nippert-Eng 1996: 7)。透過日常生活的各項實作，我們得以連結制度性的社會文化分類與人們腦子裡的認知圖像，包括我群與他群之間不可見的社會界線。在本土的研究案例中，藍佩嘉(2008)運用畫界工作的概念討論家務雇用關係中，勞雇雙方如何看待與建構彼此之間的階級與國族的界線，體現在食物、空間與隱私等家庭生活的微觀政治與日常鬥爭。本文延續此一理論軸線，討論台生如何在指認我群與他群的差異時，透過空間、語言、穿著、社會交往、親密關係等實作來強化或淡化界

8 本文對「論述」概念的界定基本上呼應傅柯的討論，指涉超越行動者的文化性與制度性的言說。本文使用「敘事」來指稱行動者（包括個人與集體）如何訴說故事來對時間性的經驗賦予意義（蕭阿勤 2008）。

線；我們也將區辨不同類型的畫界工作，以強調台生之間的異質經驗以及能動性的不同展現。

二、招收台生的制度脈絡

1985 年，中國政府正式開放台灣學生與港澳、華僑學生進入高校。1985 到 2000 年之間，累積招收了來自台灣的 2,895 位大學生與 864 名研究生。然而，2001 到 2004 的短短四年間，入學台生人數增加為大學部 2,875 人、博碩士 2,766 人（聶傳清 2005）。根據中國教育部資料，截至 2010 年底，在中國高等院校就學的台生共 6,886 人（含博碩生與本科生）（張冬冬 2011）。尤其在 2010 年後，中國政府開放台灣高中生以學測成績申請免試入學，台灣政府也開放承認中國 41 所頂尖大學的學歷。這些數字與制度的變化顯示，前往中國高教就學的台灣學生在擴充成長中。

台生人數的快速成長，受惠於中國政府開放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特殊入學管道。我們在另文中（吳伊凡、藍佩嘉 2011），已詳論相關的政策框架與制度管道，在此僅簡單勾勒政策演變的歷程。改革開放後，在「統一祖國」、「實現現代化」的僑務政策目標下，中國政府設立了「港、澳、台、僑」⁹的平行分流與區隔入學管道。由於學費差異政策，中國高校可從招收港澳台生取得豐厚利潤，加上教育制度差異與資訊的不透明，仲介或人脈關係有操弄入學管道的相當空間。在港澳回歸前後，中國政府開始針對港澳台生，明訂學費範圍、制定多元入學管道，並提供多方面的「方便條件」與「國民待遇」。近年來，由於兩岸關係和緩與交流頻繁，中國的台生政策更趨朝向費用待遇等同本地生的「國民化」方向，台生的升學機會甚至可能比本地學生更優惠，例如，港澳台考試錄取的最低分數線，低於本地學生許多；台生現在可憑台灣學測成績免試入學。

9 在中國，「華僑」或「僑生」指的是「回國學習未在國內定居的華僑」，也就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但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

吳伊凡、藍佩嘉(2011)已經論證，旅中台生個案的特殊處在於，中國政府的招收台生政策以擬似「國內遷移」的制度框架，影響著一群在實質位置上處於接近「國際遷移」情境的台生群體。留學國政府採取的是一種我們稱之為「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政策框架，扮演台生之「領土祖國」的照顧形象，有對內鞏固政權、對外確認主權疆界的政治效果。同時，留學生採取的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遷移策略，利用制度提供的優惠教育機會遂行彈性資本積累；我們也在該文中詳細討論，台生的曖昧身分如何影響其未來的就業市場機會與後續的遷移軌跡。

本文的焦點則放在另一個面向的遷移後果，也就是遷移經驗對於台生的國族認同形構的影響。本文將探討：台生肩負著「台灣人」的標籤，他們在中國老師與同學眼中的論述建構是如何？台生又如何指認出我群與當地人之間的差異？他們的自我定位與認同形構如何受到遷移經驗的影響？他們又如何在日常互動的過程中，透過具體實作來磋商自我與當地人的界線？

三、研究方法與個案說明

從 2008 年 8 月到 2009 年 9 月間，我們對 61 名旅中台生進行了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以了解其留學動機、遷移經驗與未來規劃。我們透過滾雪球方式找尋受訪者，大部分透過私人關係介紹，另外 15 名是透過台生會網站¹⁰或相關 BBS 版¹¹上招募到的自願受訪者。我們除了在台灣訪談放假返台或已畢業的台生，也前往北京、上海及廣州一帶進行訪談與短期的田野觀察。¹²此外，我們也系統性地蒐集了兩岸

10 台生會為「臺灣留學大陸青年學生發展協會」(Taiwan Students Union)，通過內政部立案成立。網址：<http://www.cy21.net/>。

11 包括 PTT 站上的台生版(TWSU)、兩岸生活版(Cross_Life)、兩岸工作版(WorkinChina)等。網址：<telnet://ptt.cc>。

12 其中三分之一的訪談(上海、部分台北)由藍佩嘉執行，三分之二的訪談(廣州、北京、部分台北)由吳伊凡執行。

的相關政府制度與新聞報導。

我們期望呈現不同的台生類群在遷移動機與經驗上的可能差異，因此，在大學部或碩博班分別擇取一定比例的受訪者，並且包括多元的科系分布。受訪個案中，有 32 名大學生、20 名碩士生、9 名博士生；其中 33 名為女性，28 名為男性。受訪者的求學專業分布上，就讀醫學（中醫與西醫）有 20 名，就讀商管科系有 15 名，經濟、社會、人類學等社科學群 9 名，中文、電影、外語等人文系所 9 名，另有法律系所 5 名、理工方面 3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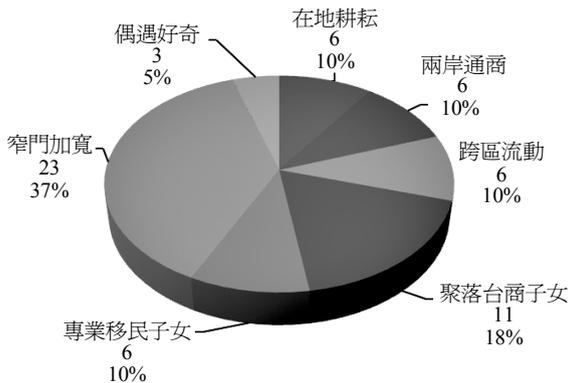
受訪者的旅中年數也呈現不等差異：在受訪當時，有 24 名在中國待了二到五年；20 名的旅中年數在五到十年之間；6 名受訪者因學家遷移，或畢業後在當地工作，已在中國定居十年以上。全部受訪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一已經畢業開始工作，其中有 16 名續留中國，9 名返台工作。

四、遷移動機：台生的次類型分析

台生的組成充滿異質性，混雜了「移民子女」、「留學生」，以及「潛在工作遷移者」等多樣型態。我們在另文中（吳伊凡、藍佩嘉 2011）已根據遷移動機，將台生分成三大類型、七個次範疇的台生類群。在此，我們僅簡要地說明這些不同台生類群的特點，以鋪陳後文討論這樣的遷移動機與軌跡，如何形塑了他們的畫界策略。表一與圖一分別說明遷移類型的劃分與受訪個案的分布比例。

表一 旅中台生的遷移類型

遷移類型		
家庭引導的學生遷移	工作導向的學生遷移	學位導向的學生遷移
聚落台商子女型 專業移民子女型	在地耕耘型 跨區流動型 兩岸通商型	窄門加寬型 偶遇好奇型



圖一 受訪者遷移類型分布

(一) 家庭引導：聚落台商子女與專業移民子女

許多台生到中國求學，其實是家庭引導遷移的結果，可以說是台灣移民的「第二代」。其中又可分為居住在台商生活圈裡的「聚落台商子女型」與父母在大城市從事專業工作的「專業移民子女型」。

第一類台生常見於我們在廣州的訪談，由於父母在當地設廠投資，子女往往在很小的年紀就從台灣遷移到中國，大多就讀台商學校，也有人進入當地的教育體系就讀。「聚落台商子女型」的學生，通常已設定未來的生涯目標是留在中國接管家庭事業，或在鄰近的台資企業發展。

相較於「聚落台商子女」，「專業移民子女」的發展策略較為多元。其父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從事專業工作，或在針對本地市場的服務業中經營餐廳、店家等，較不依賴台灣人的族裔經濟。這類型的受訪者，在中學階段大多就讀國際學校或港澳台專班，也有人選念當地學校。他們期待未來踏上父母後塵、在全球城市從事專業工作，其資本累積策略在空間上有較大的彈性。雖然其中有不少人傾向在中國發展，採取較積極的融入策略。然而，在中國讀書的經驗，對於這些家庭移民子女來說，並不構成特殊的文化資本，又難以和成績優異的本地同學相競爭。因此，父母往往安排他們將來到歐美國家留

學，以累積國際生活經驗、取得具有先進國光環的學歷，好讓他們回到中國市場時能凸顯階級秀異。

（二）工作導向：在地耕耘、跨區流動與兩岸通商

第二大類的台生，前往中國求學的目的與當地市場提供的潛在就業機會有密切關係。他們缺乏家庭的在地支持，但留在中國發展的動機強烈。不像台商或台幹的子女，在家庭遷移的過程中能夠逐步累積在地知識與人脈，這群單打獨鬥的台生，必須靠自己在求學的過程中，快速累積在地經驗的文化資本，與拓展人脈的社會資本。

依據他們著眼的就業或創業市場，又可細分為以下三種次類型。其一是重視本地市場的「在地耕耘型」：未來期望在中國就業或創業，積極尋找在當地機構實習、工讀的機會。其二是「跨區流動型」：以中國為跳板或腹地來放眼國際或區域市場，以修讀 MBA 或 EMBA 的台生為主。同樣覬覦中國的市場，在地耕耘型台生看到的是本地龐大人口的商機，跨區流動型台生則期待藉中國經驗接觸到更多的全球客戶，有助於他們未來在跨區域市場的流動。其三是工作導向的「兩岸通商型」：看重兩岸經貿關係所需求的專業服務，如法律、會計等。他們不僅以深入了解兩岸制度的差異為目標，也努力耕耘兩岸人脈。具有台灣人的身分，又擁有區別於其他台灣人的在地知識與中國經驗，讓他們成為台商仰賴的專業服務夥伴。

（三）學位導向：窄門加寬型與偶遇好奇型

最後這群台生是比較典型的「留學生」，學位與教育是他們到中國的主要目的。其中最大宗是以醫學領域台生為主的「窄門加寬型」，他們之所以到中國求學是因為台灣無法取得類似的教育機會，其中絕大部分研讀中醫或西醫。這群學生有的背負家人的職業期望，有的則是自己希望從事此專業，在台灣考不上醫學系或中醫系的狀況下，因此到入學管道相對容易的中國習醫。這類學生在畢業後面對高度的不確定性，由於台灣政府並不承認中國醫學學位，以台灣人的身

分進入當地市場執業又有困難，這些制度上的不確定性，考驗著他們在未來是否能夠成功地把學位資本轉換為勞動市場中的價值。

學位導向的第二種，我們稱之為「偶遇好奇型」，以研究所的個案居多。有些台生因為個人生命經驗偶然衍生到中國留學的際遇，例如，小武因為台灣女友去中國念碩士，他也跟著準備考試，雖然等到考上後兩人分手了，他仍循原計畫前往中國就讀。有些人則是基於個人的好奇，如大學畢業後前往中國念商科碩士的小莉，因為在台灣時看到來交流的中國學生很厲害，所以「想去中國看看」。由於這些人並沒有長期遷移的計畫，也沒有明確鎖定未來的工作地點，他們往往在畢業後返回台灣，或因感情（與本地人交往或結婚）、找到當地工作等非預期因素而續留中國。

五、台生體驗：「台灣人」 如何被中國人看待

在中國就讀法律研究所的思漢，這樣描述中國學生眼中的台灣人：

這麼說吧，我們是異類。對本地生來講我們是一群很特別的，他們沒有見過的。我跟你講一個很好笑的例子，我2001年去四川參加一個國家[中國政府]辦的活動，上面寫了「台灣學生夏令營」。大老遠就有人尖叫跑過來，你知道嗎？我們都被嚇到了，我們在學校裡面逛，就有人跑過來說：「你們是台灣人嗎？」我就說，台灣人又不是猴子，也不是在動物園。

在中國念中文博士班的小沈，也清楚意識到自己的台灣人身分在當地老師與同學之間的高度可見性，並感到些許困擾：

我們[同門學生]每個禮拜都會和老師meeting一次，就大家坐

下來吃東西，喝喝茶聊天。我後來都不太想去，因為老師每次都愛問我台灣的東西。問我看不看連續劇。我覺得我們老師關心我，有時候我想要落跑。因為老是關注我，我很不自在……有一次他問我許純美你知道嗎？我就吃驚，老師你怎麼連這個都知道，還拿出來討論。老師對台灣政治政黨生態之了解，每次到了喝醉的時候，整個就是台海兩岸的情勢分析。就說真的很累。

中國師生或民衆對於台灣人的「好奇」源於何處？其具體指涉為何？台生與當地人互動的過程中，體驗與接收到以下訊息：首先，在中國的國族論述裡，台灣是不可缺少的一塊；國民教育內容中屢屢提及台灣的歷史與地理，使得阿里山、日月潭都成為中國民衆如數家珍的名勝，甚至被賦予連台灣民衆也沒有聽過的傳說故事。然而，冷戰期間的長期隔絕加上政治藩籬的阻隔，使得兩岸缺乏實際的生活接觸。這種「熟悉又陌生」、「流離境外的家人」的論述位置，使中國民衆對於台灣有著霧裡看花的曖昧想像，進而衍生強烈的好奇。

思漢拿「異類」來描述台灣人的身分位置，看似與中國將台灣視為同一國的論述有所衝突；然而，正因為中國國族主義的論述背景與兩岸長期分離的現實狀況，讓台灣置身於一個「同中有異」的論述位置。台生所體驗到的被中國民衆觀看的方式是矛盾的，台灣人既被看作「一家人」，又在兩個意義下成為相對於中國人的他者：一、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同於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二、台灣獨立的政治意識，形成對中國國族主義論述的對立與挑戰。

（一）發展論述：台灣人作為資本主義他者

許多台生提到大陸同學知道自己是台灣人時，第一個反應都是「你們家是有錢人」。老師也普遍預設台生的家境比較好，對於獎學金的需求比較低。最明顯的，還是台生在校外生活的購物經驗，許多人都有被「砍」、「敲竹槓」的經驗，因此，在小販、計程車司機前

避免洩漏台灣人的身分，或是掩飾台灣人的口音與用語，成為台生之間口耳相傳的生活要訣。

台生所接收到的中國民衆懷有「台灣人都是有錢人」、「台灣人都商」的印象，除了因為兩岸平均所得與物價上的落差，還有兩個象徵性的原因。其一，台灣約比中國早三十年邁入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在發展主義的論述框架下，經濟與社會發展被預設為單一線性的階序，「進步」的先行者成為「落後」的後進者所欽羨的對象。其二，開放初期遷移到中國的第一批台灣人就是「台商」，這樣的歷史因素與台商在當地的高度可見度，讓中國民衆衍生將部分（台商）代表整體（台灣人）的指認邏輯。

當地同學對於台生作為資本主義他者的好奇，主要表現在在對台灣流行文化的興趣與欽羨。由於「康熙來了」等電視節目在中國「紅火」，大學生透過網路與光碟大量吸收媒體影視再現的當代台灣，面對台生時經常出現「你跟小 S 口音好像喔」、「你說話跟周杰倫一樣」等評語。在中國同學的凝視下，台生成為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體現，如念中文系的小沈所描述：「好比上海人是全中國最驕傲的地區的人民，但是他們碰到台灣人的時候，氣燄就沒辦法那麼高，因為我們台灣人比他們更懂得流行、吃穿等等，他們驕傲的那一切就不存在。」這樣的論述建構也經常轉換為台生在交友過程中的吸引優勢，如一位受訪者描述：「他們就都是覺得你是台灣人，所以接近你」，不論對男性或是女性台生皆然。

對照於中國媒體與教育中呈現的想像中的台灣，活生生的台生好比是台灣的代言人，引起中國民衆注目與好奇。這些好奇的眼光，經常衍生成為當地校園裡對台灣人的特殊待遇，甚至有老師在成績上會對台生「放水」，但這樣的特殊關照也往往引發許多台生感到困擾的詰問，尤其是與統獨相關的政治議題。

（二）國族論述：台灣人作為台獨意識他者

幾乎每一位受訪台生都會提到的經驗，是被當地的老師、同學詢

問對於兩岸統一或台灣獨立的看法。芸芸在國小時就隨著父親被外派到東莞而舉家遷移，現在當地大學念文科的她，仍然很煩惱老是被人問到有關台灣獨立的問題。從國小開始就進入當地學校就讀的芸芸，體驗過少先鋒隊唱隊旗歌時的團結場景，也曾為此感到振奮。小學四年級的大陸同學曾經直接問她：「你們為什麼不回來，為什麼要台獨？」芸芸苦笑著說：「小學的時候，我就不說。現在就會說，我還是覺得現在這樣好一點，就我不會想要回歸什麼的。他們通常也是笑一笑，可是有些人就會跟我爭辯」，她無奈地搖頭：「可是我真的懶得跟你爭辯這些問題。」

對於為何當地人這麼愛問台灣人統獨問題，芸芸這樣詮釋：「他們只是要爭一口氣，他們就真的很愛國就對了，想要把你吸過來，這是他們的義務，就是把你納入我們的團體這樣。」這種希望「把你納入我們」的談話互動，源自於中國的國族主義論述，透過教育、媒體等意識形態機器，長期以來把台灣人建構為大中國流離在外的「家人」；而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則以「家變」或「叛國」的方式強烈挑戰中國國族主義。在微觀層次的互動裡，以上充滿內在緊張的國族論述，轉化成當地人在日常對話裡的認同展演劇碼，他們透過不斷詢問台灣人支持統一或獨立的立場，以確認或強化中國大一統的國族疆界。

面對這樣的國族論述與認同展演，有些台生在互動裡順應或肯認這樣的國族想像，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嘛」的方式敷衍回應，也有少數人會在私下場合正面回應當地同學的詢問，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台灣認同立場。大多數的台生則是以模糊的方式來迴避這類敏感議題，例如芸芸以「懶得爭辯」的方式來回應，就是很典型的台生反應。又如被父母送到中國念醫的筱玲，面對這類的詢問，她一律回答：「我是學生，我不管這個，我是小孩子。」

紅豆隨著父母搬到北京已有七年，現在大學念商的她，認為自己回答此類問題時採取了很好的模糊策略，既順應當地人視台灣為「家人」的國族成員認定，因而可以讓對方停止詰問，同時也表達自己偏

好保持現狀的立場：

他們很多人問我說，喂你要統一還是台獨。我說我為什麼要呢？現在這情況不很好嗎？什麼好處都給我們，我為什麼要呢？他們就想說也對喔，那幹嘛呢？我說現在情況不是很好嗎？你們現在去也是很方便啊，大家都搶著要。只有現在情況曖昧不明最好。你知道戀愛最幸福的階段是什麼，曖昧啊！娶進門家裡面叫黃臉婆好不好！他們對這個說法很能接受。

兩岸關係的想像連結與競爭敵對，將台灣人安置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論述位置，也讓台生的言論或批評顯得格外敏感。就讀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的台生，尤其感受深刻，例如，在中國念法律碩士班的小武，就深意識到自己特殊的發言位置：

小武：台灣人對於大陸的任何批評都會是敏感的，包括在論文選題目的時候，都不可以寫。這個老師會直接跟你講這一段拿掉。

訪問者：可是今天如果是一個中國當地人寫的？

小武：沒有問題……就是同樣的一個題目，一個本地人寫、一個台灣人寫，台灣人會被要求拿掉，本地人寫沒有問題。

訪問者：所以台灣人的批評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小武：我覺得他們有一種既自卑又自大的感覺。就是他們覺得你台灣就是一個小島，沒什麼了不起的。可是當你遇到來自這個小島的人批評的時候，他又覺得你深深傷害我的感情。呵呵呵。

在學校舉辦的中秋聯歡晚會上，平日相處甚歡的大陸同學慫恿要小武一起合唱「東方之珠」，他心裡爲了這首是香港回歸時的歌曲感到不舒服，懷抱「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心情，他說服同伴改唱「愛拼

才會贏」的台語歌。不只是小武，其他台生（如思漢），也感受到在微觀的日常互動中，中國同學面對台生有一種「既自卑又自大」的態度，不是把台生等同於「台商」，就是看成潛在的「台獨」，同時，他們這兩種指認台灣人的方式，其實有著內在的關聯：

思漢：他們[當地同學]都跟我講一句話，就是你還是回台灣工作吧。其實到現在來講我們對他們來講就是台商。

訪問者：台商？

思漢：對啊，他認為你當台商比較好，你幹嘛跟我們搶這些薪水這麼少的工作。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而且那時候來的時候大陸同學有兩種心態。第一種心態是很好奇把你當猴子看，第二種心態因為自卑而產生的厭惡感。因為他覺得我跟他不是一群人，他覺得我很討厭。

訪問者：很多人跟我說他們[當地同學]會來搶他們，來挑政治的話題。你覺得是因為……

思漢：對，對就是因為自卑。早期啦，因為台灣人在大陸滿強勢的，現在可能沒有了。因為那時台灣人的錢比較大，或台灣人比較有錢。所以那時候給人印象都比較不好，連在一起，[他們]就會過來跟你搶政治。

以上，我們呈現了台生與當地人互動過程中，所體驗到中國人如何看待、指認台灣人的兩種方式，或者說，台生所感知到當地的論述脈絡如何召喚他們進入特定的「台灣人」主體位置：一方面，台灣作為資本主義他者，在發展論述的框架下，被視為具有現代與流行的進步優勢，尤其在改革開放前期的遷移經驗中，體現為以「台商」為代表的階級支配；另一方面，台灣作為台獨意識他者，在中國的國族主義論述中，是大一統地圖中不可或缺又大不相同的一塊拼圖。思漢的說法，進一步呈現了兩者之間的關聯。在微觀的日常互動中，中國同學面對台生往往有一種「既自卑又自大」的態度，面對台灣相對於中

國的發展優勢，感到不足，甚至被威脅，進而在言語上挪用、強調「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國族論述，以此確認中國相對於台灣的政治強勢。

六、指認差異：台灣人眼中的「中國人」

那麼，台灣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國人？更具體的說，我們研究的旅中台生，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指認我群（台灣人）與他群（中國人）的差異？所有受訪者最津津樂道的主題之一，便是他們在中國生活發生的大小事中，所感知到的人群差異，從日常生活的各式短暫接觸，如搭捷運排隊、搶出租車、店員不禮貌等，到深入一點的互動，如能否住本地宿舍、是否與當地朋友來往、有無與當地人交往等，都被台生指認出來，標示出我群與他者的重要分界。

（一）素質論述、他時化敘事：中國作為發展落後的他者

台生指認兩岸人群差異時，主要運用的是一種「發展落後的他者」的敘事。中國在經濟發展上的落後，展現為台生與本地學生在消費能力與習慣上的差異，進而影響到友情交流方式，或出遊地點選擇上的不同。本地學生的休閒活動，多是不花錢的踏青、騎單車春遊，台生卻喜歡唱KTV、吃台灣菜。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導致消費的檔次也有差異，如一名台生這樣解釋他為什麼很難跟本地人交朋友：「他們一杯星巴克都捨不得喝，你要怎麼跟他們出去玩？」

在中國甚有影響力的「素質」公共論述，也經常被台生用來描述我群與當地學生之間的「文明發展」落差。本地學生被指認為衛生習慣差、文明水平不夠、素質比較低，相對而言，自認為比較衛生、文明、現代、有素質的台生，感覺難以與本地學生同住或來往，彼此之間的界線是難以跨越的鴻溝。例如，仕威自認經歷過重要的心態調整，目前已能融入當地社會，做到成為大陸同事的「自己人」；但回

想自己一路的心路歷程，他仍然感受到兩群人在生活習慣上的格格不入。現在外面租房子的他，提到一年級時與本地同學合住宿舍的情形：

我同學他們吃東西，都是吃一吃丟在地上，然後瓜子就在地面上，也不會拿去整理一下，兩三天才掃一次地板，我無法接受。我的觀念是像果皮的東西，吃完就要把它清掉，因為它會長蚊子。就是有很多觀念和他們有很多落差，這樣就會有摩擦。你不要小看這些事，每天處理這些事你會很不爽，連生活都有困難……有時台灣人無法跟大陸人在一起是正常的。

多數台生都沒有住在學校宿舍裡，租屋時也避免找本地人當室友。台灣護理系畢業後到北京念中醫的小櫻，承認自己「沒有辦法跟 local 的人住」，她描述有次她在當地找房子，遇上房東詢問是否願意一起合住的經驗：「我其實很委婉的想跟他說，我們兩個一定沒辦法住，會吵架。他說不會，你說說看。我說共同費用有時候可能會吵架。他說不難啊，如果你要天天洗澡，就多付一點水費。我想，天天洗澡還要多付你水費……我就覺得不用再說了。」

事實上，到外地居住的生活體驗，必然有文化探索的層面，遷移者在移入國生活並與當地人互動，往往未必是消弭了人群界線，而是更鞏固了主觀感知到的差異。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為何這類文化再探索的主題，重新認識中國與指認自己與當地人的差異，會成為台生之間如此重要的集體敘事？

誠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所引用小莉所說的話：「到大陸，人家會覺得好像是同一個地方，可是實際上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地方，那感覺更詭異。」甚至，對於許多台灣學生，尤其是年紀較長的研究生，過去在台灣研讀的歷史、地理課本仍然充斥以中國為尊的教材內容；如同共產黨強調兩岸是「一家人」，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國族論述，也將中國視為「同文同種的祖國」。許多台生都提到剛到中國時有類似小莉

的感覺：

訪問者：像你第一次去大陸的時候，會有回到祖國的感覺嗎？

小莉：我只是覺得，哇，課本上的東西講的是真的。因為從小我們學的那個，根本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到大陸念書以後，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去走在長江上面，我第一次見到長江的時候我超興奮的，這就是長江耶！課本上寫的長江耶！這是真的耶，我走在長江上面耶！

這些意識形態教化，雖然因為與現實的脫節（「根本跟我們沒有關係」），在台灣人主體浮現的九〇年代以降，在年輕世代身上並沒有太成功的內化效果；然而，仍讓多數台灣人把「大陸」看成不是一般的「外國」或「不同的地方」。「同文同種」的想像與預設，不僅讓現實中兩岸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的差異，顯得格外醒目；更重要的是，對照於「同出一源」的國族論述，台生透過「殊途發展」的政治經濟史觀，來凸顯雙方「進步 vs. 停滯」、「現代 vs. 落後」的兩極結果。

台生運用「發展落後的他者」的敘事來標記人群界線時，也運用了一種「社會時間錯置」的修辭，例如，我們經常聽到「大陸好像三十年前的台灣」的說法。這與 Glaeser (2000: 148-150) 有關兩德人群指認的研究發現，有許多類似之處。他描述西德警察將東德警察「他者化」的方式之一，是用「他時化」(allochronism) 的敘事，¹³ 就是否認東德人的共時性(coevalness)，將其放置到另一個「社會時間」，也就是落後、停滯之處。置身於發展主義的論述框架下，他時化的敘事把單一線性發展路徑的歷史時間，切割成爲不同發展階段的「類型化時

13 Allochronism 的概念原本是由 Johannes Fabian (1983) 所提出，批評人類學家看待研究部落時，傾向將後者放置在一個不同的社會時間(傳統、落後)，與人類學者來自的「現代」社會之間的時間關係是不連續、排他的，從而達成空間上的「距離化」(distancing)，以及政治上的「他者化」效果。Glaeser (2000: 146) 將 Fabian 所討論的研究者的認識論，延伸以描述常民的認識論。「他時化」則為藍佩嘉的翻譯。

間」(typological time)。即便台生與本地生身處於同一物質時空，透過社會時間錯置的認知框架，也合理化了彼此在社會空間上的區隔，如前言中仕威所言，「有時台灣人無法跟大陸人在一起是正常的」。透過指認文化差異，台生「自然化」(naturalize)他們與本地學生維持社會距離的必要性。

(二)「共產主義遺產」敘事：中國作為政治他者

台生指認「大陸的落後」的歸因過程中，經常運用「共產主義遺產」的敘事。中國人被視為「共產主義的他者」，其人心與人性的負面特質，都被認為是共產主義的歷史遺產，甚至加以本質化，例如，經常有台生描述「這就是中國人很有名的民族性」。最常見的論述是，許多台生用「文化大革命摧殘的結果」來理解當地人的「沒有禮貌」、「親情淡薄」、「說一套做一套」。即便台生們的同班同學，多是八〇後的世代，台生仍然運用「共產主義遺產」的敘事來描述中國年輕世代的人格特質。

為了追求跨區流動而前往中國念商科碩士的M小姐，想要在中國這個國際市場累積本地經驗，但又感到與大部分的本地同學很有距離。她提到班上同學合作團體報告常有人「搭便車」，她認為這樣的「文化和態度」差異源自於共產主義的歷史：「因為這邊的以前吃大鍋飯吃習慣了，所以為什麼他要特別努力？他其實可以活下去。他們不是都靠著……以前啦，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不是都是靠著別人在活嗎？反正我種不種都是拿糧票去領那個糧，我覺得[現在]還是有那個態度。」當我們追問有類似說法的台生，八〇後的世代其實沒有經歷過共產主義生活時，受訪者往往用模糊的說法，例如文化的傳承，甚至基因的遺傳，來延續共產主義敘事的合理性。

除了歷史軌跡的分歧，兩岸當今制度的差異，也是台生最常用來理解自己與當地人在價值觀、政治概念等「深層差異」的歸因方式。例如，中國比較教條式的教育方式，讓本地學生呈現「呆板」、「死讀書」、「目的性太強」。又例如，台生們很常用一胎化的政策影響

來解釋，他們在本地結交的伴侶或好友，為何顯得「嬌寵」、「自我中心」、「不尊重別人」，因此認為與自己在家庭觀念與對長輩的態度上有著「無法溝通的歧異」。

又如，有些台生認為，與本地學生難以親近溝通、台式笑話無法在當地得到共鳴的原因，不是因為口音或用語的差異，而是因為本地學生在共產黨的體制中成長「不夠現代」、「太古板」。父親在中國設廠、在當地大學念商科的小魏，夾雜著英文與台語告訴我們：

大陸的文化……不想去認識囉。噓[聲音變小]，這邊的人啊怪怪，素質都比較低啊。所以跟他們真的會合不來……第一次有人我搞笑他們聽不懂。喔，shit，shit。很大的打擊囉！因為他們素質太低了聽不懂，以為我講的是真的，不是搞笑！哇塞，你爸[台語]開玩笑都聽不懂。類似這種的很多。他們應該是古板，腦袋太古板的思想，像我們比較現代一點，生活方式不一樣。他們從小一就說一、二就二嘛，共產黨就這樣，開玩笑的很少。

台生的「共產主義遺產」敘事，具備所謂的「因果關係的情節賦予」(causal emplotment) (Somers and Gibson 1994)，用共產主義的制度原因，將不同的事件與部分做選擇性地取用，在簡化與重組後，以時間的序列（不論是個人、家庭或社會為單位），進行因果性的連結。以如此敘事來指認中國的同時，隱含了一體兩面的我群認同敘事，就是一個「斷裂」或「分歧」的國族敘事，雖然接受台灣與中國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同源，但因為共產主義的制度差異，導致歷史的斷裂與後續發展的分歧。

（三）「中國崛起」、「暴發戶」的新興論述

最後，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躍進，也讓台生開始對於中國產生一些不同的看法。相對於前述將中國視為「發展落後的他者」，近來

在台灣與國際間討論熱烈的「中國崛起」說法，則呈現另一種矛盾的新興公共論述。此論述呼應發展主義、全球化的論述，更結合中國國族主義的論述，強調中國的地理規模與快速發展，將以大國經濟的優勢占據重要的國際利基。我們訪問期間輔進行的北京奧運與積極籌備中的上海世博會，作為重要的「中國崛起」展演儀式，也讓許多身歷其境的台生印象深刻，但對於國族認同的影響在個案中則有不同的情形，後文會對此再做討論。

近年來快速勃發的中國經濟，讓許多年輕一代的中國學生，也享有優渥的物質條件。在這種狀況下，台生區辨我群與這些富裕本地生的界線，不再單純是財富高低的差距，而是更細緻的文化資本的高低。在廣州念企管的女生阿沛，和念醫的男生阿龐，如此描述他們如何從外表與穿著指認出外招生（港澳台生）與內招生（本地學生）：「外招生感覺比較穿的好一點，有品味一點」、「內招生穿著比較隨便，有時候要打扮，又穿著很怪、很大膽，比港澳生還大膽」、「他們可能家裡很有錢，但是他們覺得穿那樣很好看」、「他們穿著太吸引人，整個是品味的問題」。他們視港澳台生的穿著打扮為有「品味」的「低調奢華」，相對而言，新富家庭的中國學生，則被看成缺乏文化資本、體現過分招搖的暴發戶美學。

前一節提到，中國人面對台灣人，有一種「又自卑又自大」的心理叢結，在當下的歷史時刻，台灣人面對中國人，同樣有一種「又自傲又自卑」的心理叢結，我們將在後面的「畫界工作」一節中，進一步討論台生們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定位自己與「崛起的中國」的關係，進而採取不同類型的畫界工作。

七、中介之闕：夾在中間的台生

出生於 1980 年代初，大學畢業後前往中國就讀中文博士班的小沈，形容台灣學生在那裡像外國學生、本地學生以外的第三類人。她認為兩岸的民衆都以為了解對方，其實存在的認知落差甚巨。由於系

上只有她一個台灣人，她常常覺得有需要適時代表台灣發聲的使命。當台上教授習慣以台灣的殖民歷史解釋大部分的兩岸制度差異時，她感覺有必要呈現台灣這邊的研究與觀點：「我在那邊一個人耶，如果我不講話，那誰為我們台灣講話呢……所以我特別的注意，要捍衛我們的，讓他們了解我這一部分的台灣是怎麼樣子的。」在一些平常的生活議題上，更要應付當地同學們的千奇百問：「種種誤解，你總是得去解釋。還有人問說，台灣人的房子都是高樓大廈吧？沒有我們這邊破爛的房子吧？是不是都有窗戶啊？這種問題也可以問。」

當小沈放假回到台灣時，卻又面對台灣同學的質疑，比方說，有同學會批評中國的教育品質，並懷疑她的實力：「是不是你其實根本沒有那個實力，所以沒有辦法申請到好的歐美大學，所以你只好去大陸、靠關係。」台灣朋友經常對中國的生活方式充滿負面的批評，她也覺得有必要與義務為之辯駁：「回來台灣也一樣，他們講話有時候很汗巖大陸同胞，我就會說你又不瞭解。大陸的廁所是不是都沒有門？大陸人是不是都很落後……」小沈無奈地搖搖頭，苦笑道：「最後我覺得說，有時候兩邊都不是人。台灣這邊都覺得我是統派的，哈哈」。

小沈運用魯迅「歷史中間物」的概念來描述自己的處境：「簡單來說，我就是腳踏在兩邊的人，也比較危險的狀態。說實話，我現在要形容自己的狀況，我會覺得我沒有一個歸著點。」換句話說，台生處於「中介之闕」(liminality)的生存狀態¹⁴，不僅是在地理空間上的遷移跨界，也處在台灣人與中國人這兩種認同身分之間的曖昧界域。用白話文來說，也就是許多旅中台生提到自己「兩邊不是人」的「夾心

14 Liminality 的概念源自拉丁文的「闕限」(*limen*)，意指過渡的階段或中介的樣態，中文多翻譯為「中介狀態」或「闕」。人類學家 van Gennep 用以描述成年禮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包括分離(separation)、過渡(transition)及納入(incorporation)等階段，從而從兒童進入成年。之後由 Victor Turner 將此概念發揚光大，強調與常態斷裂的中介階段(in-between periods)對於形塑人生經驗的重要性，但他不像 van Gennep 認為過渡轉移必將導致整合納入，這樣的中介經驗可能是長期的，也未必具有儀式的性質(Thomassen 2009)。近年來有不少遷移學者沿用此概念來討論移民的經驗所具有的曖昧中介特性(如 Tsuda 2000)，本文銜接這樣的概念取向，不指涉此過渡階段一定會導向未來的同化或納入。

餅乾」處境：面對台灣人，台生感到有必要破除台灣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面對中國人，卻又得辯駁去除當地對台灣的偏見與誤解。當他們生活在中國，被期待以「台灣人」的身分與姿態發言，但是隨著居留時間的拉長，回到台灣的時候，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越來越不了解台灣。

這種介於他群與我群之間的曖昧位置，其實是許多移民經歷的處境，但在旅中台生的個案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更強化了台生身處中介之闕的狀態。首先，兩岸在長期敵對的歷史情境中，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教育下，都互稱對方為同一國族的「同胞」，不約而同將對方社會選擇性的再現，成為宣傳教材中的「受荼毒的神州大陸」與「被竊據的台灣寶島」。這使得兩岸人民更容易抱著成見揣想彼此的狀態，進而忽略了在實際生活上，兩岸的陌生形如外國。對於彼此的熟悉的預設與想像，反而增強重新認識與文化探索的困難。

其次，我們在前兩節已經呈現，兩岸民衆由於現實的長年隔絕以及政治上的敵對關係，深植一種面對對岸「又自負又自卑」的心理叢結。對於生活在中國的台生來說，雖然台灣人在中國的國族論述中被納入為「一家人」，但在實際的人群互動裡，尤其是進入職場生活後，受訪者仍感受到持續被他者化的處境：「人家還是會覺得你就是台灣來的」。

對在北京打滾 13 年、目前在中國尋求大學教職的思漢來說，由於高中畢業後就離開了台灣，自承台灣對他已經「好遠好遠」；但在工作上及日常生活中，當地人對他感興趣的還是他的台灣背景。為此，他必須要特別花時間試著蒐集有關台灣的資訊，來迎合旁人給予的定位：

如果你是台灣人你會變成是兩種身分的尷尬，比如說這麼講啦，我在這裡待的時間比較久，我對大陸一定比我對台灣熟悉，但是只要我出場的任何研討會或什麼東西，因為我是台灣人，所以我必須要說一些台灣的故事。所以變成是說我除

了做大陸人以外，我還要花很長的時間去了解台灣的人文社會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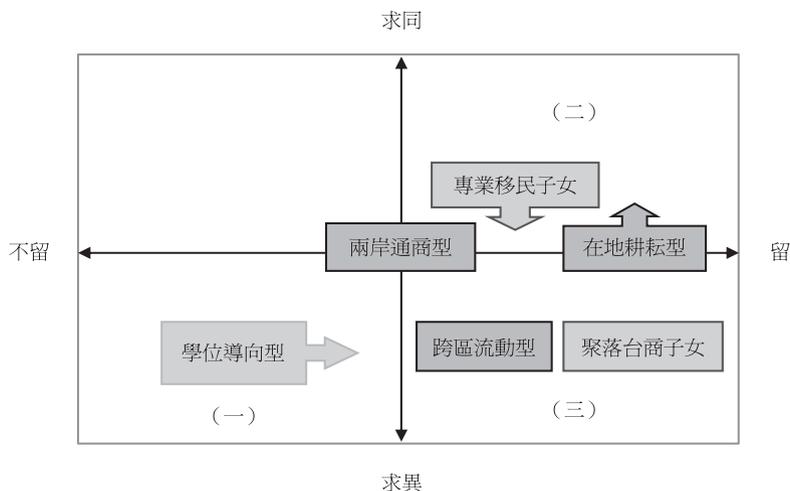
然而，當他被期待以「台灣人」代表來報告台灣之際，他也發現這樣的身分位置是一個兩面刃，既讓當地人對他好奇，也讓當地人對他無法信任。比方說，在寫研究報告時，有個同事說了一句話，讓他覺得「滿傷的」。雖然這個段落根本不是他寫的，同事仍然開口就批評他：「你帶太多台灣的模式進來。」思漢嘆了一口氣，無奈地說：「我們真的是夾心餅乾。因為其實台灣的东西我們已經不了解了，我們回去沒有辦法生活。我在這邊已經生活太久了……你已經不了解台灣了，但他們又把你當台灣人」。

在以上三節中，我們鋪陳出台生的論述位置與認同形構，如何鑲嵌在兩岸政權的國族論述，以及兩個社會的現實隔絕與政治對立的歷史背景之中。生活在中國的台生，既被視為流離的民族和家人，又常感受到自己台灣身分容易被凸顯為無法歸類的特例，因而處於一種介於他者與我群之間的曖昧矛盾位置。以下，我們進一步剖析台生如何在這樣的論述脈絡與互動情境中，發展出不同類型的畫界工作，不僅指認出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同或異，也透過各種日常實作來模糊或強化界線。

八、日常實作：不同類型的畫界工作

如前所述，我們運用座標圖的工具來分析台生內部的異質性，並用以下兩個軸線來定位他們的畫界工作策略。其一，他們後續的遷移軌跡，或對畢業後生涯發展地點的想像，傾向留在當地或返回台灣（移民—跨國民—暫居者的遷移軌跡光譜）。其二，他們如何指認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國族差異，是強調台灣人與當地人的界線、或相對淡化差異（同化—流動混雜—分化的認同光譜）。簡言之，我們用「留或不留」，以及「求同或求異」的兩個座標，將台生的畫界工作

分爲四個象限的不同型態（見圖二）。方塊的箭頭，則表示該類型可能因爲外在制度或是個人因素，而朝此方向移動。



圖二 旅中台生畫界工作的傾向分布

爲了提供讀者了解個案的分布情形，我們試圖根據以下指標來操作化「求同」或「求異」：生活方式是否與當地人趨同（如是否在學校食堂吃飯）、居住或社交的空間是否與當地人存在區隔（是否住學校宿舍、是否與當地人交友或交往）、是否淡化或維持台灣口音或語言用法、是否指認兩岸間的明顯差異，以及是否用「中國人」來指稱我群。但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認同並非單一同質的構成，行動主體可能在某一面向或指標上求同，卻在另一面向或指標上求異；再者，求同、求異實是強弱程度的分布，而非有無的範疇區分。此外，除了已經畢業的台生，就學中的台生對於未來的去留多仍在觀望，後續遷移軌跡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以上這些因素都使得以下的統計區分有一定的簡化或困難，我們只能根據受訪者當下的說法，提供大致的定位。其中有 19 名個案(31%)被我們歸爲「不確定或無法歸類」，因其傾向「求同又求異」或「不求同也不求異」，或者是未來軌跡的去留仍不確定。

本研究訪談的個案中，僅有一名受訪者落在「求同但不留」的象限，也就是打算畢業後不留在當地，但傾向看待台灣人與中國人為類同。¹⁵ 這種類型的個案數目少，在邏輯上是合理的。以下，我們將逐步討論座落於其他三個象限的台生：(1)有 12 名的受訪者(20%)落在「求異且不留」的象限，傾向在學業完成後不留在中國工作（返回台灣或前往第三地），同時傾向強調台灣人與當地人之間的界線；常見於單純學位導向的台生類群。(2)有 10 名受訪者(16%)落在「留下並求同」的象限，傾向畢業後留在中國，並強調兩岸之間的類同；較明顯的例子是高度納入本地社會的專業移民子女，以及希冀在本地市場謀職或經商的台生。(3)有 19 名受訪者(31%)落在「留下但求異」的象限，也就是希望留在當地工作，但強調與本地人之間的距離和差異，例如聚落台商子女，以及尋求跨區生涯流動的台生。

（一）求異畫界與暫時居留

阿音畢業於台灣某校的商管科系，一開始前往這所英國大學的中國分部念書，是很純粹的學位考量。阿音的祖父母輩都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人，她認為外省人背景對她這一輩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她自己對於中國比較是文化上的嚮往，如從小喜歡研讀中國歷史與地理，對於她前往中國念書的選擇，因而有一些間接的影響：「你會想要去看看，父執輩一直在講的一些東西，歷史課本在講的那些東西，是不是真的。」但她到了中國後感覺與先前的想像很不相同：

阿音：嗯……會有點失望耶。因為會覺得，以前的東西會比較被美化。應該講說中國十年的文革，破壞掉很多東西。小

15 這名受訪者來自金門，畫界方式屬於「弱求同」：選擇與本地生同住宿舍、不覺得生活方式上明顯差異，但對中國並無父母輩的歷史與情感認同。中國碩士班畢業後計劃前往美國就讀博士，學成後他認為自己「沒有一定要留在大陸，我也沒有一定要回台灣」。

時候我們在念的歷史的東西，是再更久遠的東西。你去你會發現接軌上的東西，你會要全部重來一次。有些東西變很多很多，尤其我跟同學聊的時候會發現，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跟破四舊的時候，他們很多觀念會變很多，變滿多的。

訪問者：發現這樣的差異對你來說，是重新認識了什麼？

阿音：就是重新認識了一個新的中國。我們在這邊常開玩笑說，台灣教的歷史是神話，地理教的是歷史。你去那邊會發現是一個新的東西。

爲了學位而來的受訪者往往比較容易面臨不符期待的落差感，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大多數中國學校的教學體制和行政體系，對於台生來說不夠開放也缺乏彈性，在學校的求學過程與教育品質，未必盡如台生所期待。其二，不像工作導向類型的台生，這類台生較少抱持「要在中國闖闖看」的個人發展嚮往；有些甚至是因爲家人對其職業的期待，而被半強迫地送去念書。對中國經驗沒有主動期待也缺乏充分心理準備的結果，這類台生往往挾帶著肯認台灣在發展階序上領先的優越感，處處衡量自己與當地人的「差距」，因而更容易衍生對當地生活與人群的高度不認同。

阿一出身自政治立場偏綠的福佬家庭。他的工程師爸爸一直期待兒子成爲醫師，所以在台灣念完高職後，家人想辦法透過關係讓他免試進入廣州一所大學念中醫。對阿一而言，在中國求學生活的日子大多是苦悶而煩躁的，他雖然喜歡中醫，但自承沒有喜歡到要爲此不顧一切留在中國。他來往的對象多是台生朋友，或是來自港澳等地的「外招生」。他租房的大廈是當地中產階層家庭才有財力入住的高級公寓。由於不喜歡當地的飲食，阿一和台生朋友們，每天光是決定要吃什麼，就是一個令人煩惱但無可避免的耗時過程。他直言，畢業後完全不會想要繼續留在中國，繼續和「這群沒水準」的人相處。由於中國醫學學位至今未獲台灣政府承認，阿一在無法返台行醫的狀況下，計畫到第三國繼續深造或考照。

我們在跟隨阿一在廣州搭地鐵的途中，他不斷觀察身旁的當地人的種種細節。當有人在地鐵上大聲喧嘩時，他會嘆氣搖頭。群眾搶著擠出車門時，他會用台語夾著怒氣說：「等一下是會死喔，無水準。」他也說到剛來的時候，地鐵上的人都穿老舊的皮鞋和爛西裝，沒有人穿時尚一點的球鞋。阿一的例子代表了很多台灣人在中國的應對態度，時時從生活微觀處找「例證」，彰顯台灣人的優越差異，也以此區辨自己和中國人的明顯界線。不排隊、趕著下車的群眾呈現素質、文明的低落；服裝打扮的方式，也是他認可「時尚我群」和「老土他者」的分界。

有些人會帶著高下意味的「水準」標示自己與本地人的界線，但也有人傾向以「文化差異」的相對概念刻劃人群之間的界線。以阿音為例，當許多台生困擾於不知要如何歸類自己在當地的感受時，阿音清楚地指稱當地為「中國」，以「斷裂」的歷史敘事，將當下的經驗理解為「文化差異和隔閡」：

常常我覺得很多台灣學生到中國念書，都會因為同文同種的關係，還有同語言的關係，你會以為其實你只是到另一個中文延伸的地方去。尤其中國跟台灣是一個很奧妙的關係，不像說你去香港或一些華人地區的地方。可是我覺得，回歸到一件事情，你本來就要有的概念，中國跟台灣已經是不一樣的東西了。對我們來講，雖然用同一語言，可能是根源那邊的，但是那整個歷史跟生活的發展，他現在對你來講就是另一個新的國家。如果去美國可以接受美國的文化，你為什麼不能去中國接受中國的文化？

阿音藉由類比「去中國就像去美國」的方式，以「外國」的相對概念來理解中國生活中各種格格不入之處，讓她能夠用「尊重當地人的文化」的認知方式，來減輕心理上的負擔。目前還在就學中的她，雖不排斥留在中國工作，然而，現在還沒有交往對象的她，卻已經斬

釘截鐵地決定未來成家、生小孩後就不留在中國工作。

阿音：我希望如果結婚後，小孩是留在這邊[台灣]。¹⁶

訪問者：喔你希望家庭是留在這裡的，妳現在有男朋友嗎？

阿音：沒有，就是規劃。所以我沒有打算馬上留在中國工作，因為我希望將來小孩子在這邊，我不希望我將來男朋友是中國人，那以後就變成在那邊落地生根了。

訪問者：為什麼？

阿音：我對那邊的文化還是有些東西不能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尊重你的文化，但是我要跟這邊文化的人在一起，我以後孩子要接受這種教育，我不能擔保他們能跟我是一樣的。就是我不能做的事情，我能忍受你做，但不代表我能做。這就會是我自己的一個隔閡吧，我的障礙會是卡在這裡。

對於學位導向的台生而言，求異的畫界策略，可能源於沒有打算留在中國發展的遷移動機，同時，認知到兩岸之間的巨大差異，也可能導致他們在畢業後不久留當地的後續遷移路徑。前面提過因偶遇因素前往中國念碩士的小武，清楚標榜自己支持台灣獨立的政治立場，在受訪者中是比較少見的情形。他在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一段時間，也在就學時結交當地女友，但兩人因為小武所謂的「文化差異」而經常吵架，例如女方難以接受他對中國制度的批評、女方過度依賴父母等觀念上的不同，最後導致分手的結局。兩岸的文化差距與政治關係成為這段親密關係中的陰影，如女方父親在分手後向小武表示：「因為台海局勢不穩定，你們決定分手也是好的。」小武描述在中國的日子裡，「每天生活上都會遇到一些小挫折」，讓他經常感受到一種深層的孤獨：「我覺得那時候主要是一種，心理上的寂寞吧。就是你每天就會覺得這一些人就是跟我不一樣，我為什麼還要在這裡。你可以

16 訪談是在阿音返台度假時進行。

很明確的感覺到，就是很明顯的兩個群體。」基此，他放棄當地的感情與工作，返回台灣生活。

（二）求同畫界與在地居留

傾向留在中國而採取求同策略的台生中，第一大類是因為家庭遷移而散居在大城市的「專業移民子女」。他們相較於台裔子女，相對重視結交當地朋友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也在全家移民的生活經驗中逐步培養「這裡是我家」的自我認同基模。

2004年時，由於父親被挖角到北京的外資企業擔任主管，尚在中國就讀的雨蓓就隨著全家遷居北京。雖然移居主要是因為工作，但家庭的族群背景也相當程度影響了這樣的遷移決定。雨蓓算是「外省第三代」，父母雙方的家庭都隨國民政府遷移來台，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2004年父母舉家移居北京後，不僅在北京置產，台北的房子也賣掉，最接近「移民」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雨蓓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並未隨之「返鄉」，只是每年來北京探望小住，因為他們的朋友圈還是在台北，而且認為台灣的醫療可以提供比較好的照顧。

對於年輕的雨蓓來說，祖父母的故鄉對她來說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地方，只有在飲食與口音上感到比較沒有距離。訪談中她首先談到了初抵中國的感受：

因為我是從台北到北京，到北京的那一刻因為一開始我是抗拒的心態……後來是我已經人在這裡了，我可以接受這個事實了，然後我就等於淨空整個心態去看這個地方，然後我會發現有很多東西是我不知道的，然後整個環境我也是陌生，所以我要重新去認識他才可以，不可以用刻板印象去抗拒或什麼的，所以我就等於是重新認識這個城市，然後剛剛好在那一段時間我是十六歲，就等於是思想剛成熟的時候吧。

雨蓓在「淨空」與克服「抗拒」心態的過程中，恰好經歷北京奧

運籌備到開幕的歷程；這讓她近距離目睹中國的快速崛起，衍生一種「與有榮焉」的心情：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家後面都還是一片工地，然後才隔了半年、還一年就全部都建好了。你就會發現哇塞好快喔，然後所有的高速公路啊然後高樓大廈啊，就在短短時間咚咚咚全部都蓋起來了。然後晚上你看整個長安街你看北京的城區，你會覺得，哇！真正的大都市是長什麼樣子，你會感覺好像是在電視上看到夜景下的紐約或是拉斯維加斯那種感覺。這跟台灣很不一樣，台灣是相對溫馨的一個地方，因為小小的……我覺得一個城市的進程就這樣子被我在短時間裡面看過去了。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也有成就感，因為我剛好參與了北京成長的這一段時間，然後又看到整個北京的進步，讓我覺得大中華範圍之內，我能生長在這個城市裡面，我是幸運的。

雨蓓自述在中國就讀的這六年並不算是「出國留學」，而是「很徹底的反正我就是把北京當家」。不像許多其他受訪者用「斷裂」或「分歧」的歷史敘事來理解兩岸的現況差異，雨蓓用「目睹中國的崛起」、「參與大中華發展」，以及「中國躍上國際舞台」的敘事，來描述自己的遷移經驗與國族認同。面對台灣人訪問者，雨蓓還是補充說：「其實也不能說我沒有台灣認同感，我還是有的」，但她也直言不諱地說：「但是我更能夠認同大陸，我比一般的台灣人更能夠認同大陸，而且看這個情勢發展，我覺得在大陸也不差啊」。

在雨蓓逐步建立以「中國人」為主要認同的過程中，父親扮演了積極的引導角色。原本就讀國際學校高中部的她，在爸爸看到她身邊都是外國人或台灣人、「連男朋友都交台灣人」時，告誡她：「你幹嘛，就跟大陸同學在一起啊，多了解一下當地的情況不是很好嗎，你乾脆轉學好了。」之後，父親毅然決然將她轉到本地中學，雨蓓也欣然接受。對於雨蓓和家人來說，建立人際關係、甚至是親密關係，是

很重要的求同畫界策略，以達到融入當地社會的重要目的。現在大學裡念社會科學的雨蓓，爲了了解中國的思維方式和用語邏輯，在爸爸要求下，早就開始閱讀當地政府的公文，並且學習他們的用詞用句，甚至是處處加上政治色彩的寫作方式。爸爸強調：「就要學，你就必須那樣寫」。

前面提到，許多台生用「他時化」的敘事來否認中國的共時性，以證成後者的落後以及當地人的難以近距離共處。雨蓓雖然也使用「他時化」的敘事，但結論卻截然不同。她說：「因爲大家都知道整個大陸都是比台灣開發的晚，那因爲他基礎的時間本來就是短於台灣，你不可以用台灣的標準去看這裡，你要處於當地人的標準去看這個地方才對。」雨蓓闡釋自己轉換視角、追求「同化」的決心：「我就是把我自己當作北京人看待……當初來我是有一點半強迫的方式讓我自己進入到這裡的社會裡面，我是讓自己的思想啊什麼各方面都融入到這裡面」。

現在，雨蓓認爲自己完全可以做到以在地角度來思考與定位自己的未來。例如，她強調自己「完全可以接受」本地人較低的薪資：「我覺得像大陸同學畢業兩千塊、三千塊，他們可以過活，爲什麼我不可以？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姿態放到最低去跟他們做一個比較，不應該還是用台灣人那種有一點點優越感的感覺，去跟他們比較。」年紀小就移居中國的雨蓓，逐步習得當地人對「人群界線」的分類觀點，與大學畢業後才到中國的思漢，對於同一件事情便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思漢提及他在工作時發現，本地公司通常不太願意接台灣客戶的案子，他認爲是「大陸人不太喜歡台灣人的做人方式」、「台灣人精明，在大陸把自己保護得很好」。同在訪問現場的雨蓓反駁了這樣的「大陸人 vs. 台灣人」的分類框架，強調這其實是「北方人 vs. 南方人」的差異，她把台灣人視爲「南方人」的次範疇：「因爲南方人一般來說都是比較精嘛，北方比較大氣」。

最積極的求同畫界策略，就是歸化入籍。我們訪談到的受訪者中並沒有人歸化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但有人轉述聽說有台生畢

業後進入中國國營單位工作後這麼做。對雨蓓一家來說，她爸爸考慮讓她在將來工作後在必要的時候放棄台灣國籍，以「政治同化」的畫界工作，顯示自己「在深層思想上對大陸的一個認同」，更容易取得當地同事的信任。雨蓓則說她目前沒有考慮放棄台灣國籍，主要還是因為「台灣護照比較好用」的實用原因。

家庭引導的第二代遷移者，如果採取求同的畫界策略，往往在教育過程中刻意選擇本地學校，提早接觸本地人思維，有助於培養當地思考的模式和行爲，這樣的家庭遷移有近似「移民」的過程。然而，即便在家庭引導的台生類型中，像雨蓓這麼徹底求同的個案仍然很少見。「專業移民子女」中，也不是絕對採取求同的畫界策略，我們在下面會談到其他個案，採取留在中國、但求異的畫界策略。

採取求同策略的第二大類，則是基於工作導向而前往求學的台生，或是打定主意要留在當地就業或創業的「在地耕耘型」，或是尋求在兩岸經貿空間中發展的「兩岸通商型」。基於未來工作或事業的考量，他們積極深入了解中國制度與文化，並希望在人際關係上打破兩岸之間的區隔，主動與當地人交往以累積中國經驗。在求學的有限時間內，他們往往必須經過來回的重新畫界過程，才有可能慢慢轉換為當地人看事情的視角和框架。

福佬家庭出身的仕威，在台灣博士班念了一年後，轉而前往中國研讀經濟博士。因為他沒有考上理想中的台大博士班，考慮去美國念書在申請與財務上都不容易，轉而報考了中國的領銜大學。仕威期待自己未來能在政法領域當個熟悉兩岸事務的跨界人才，強調像他這樣「真的刻苦的、有目標的，願意去融入這塊社會，願意跟大陸人深入交往」的台生真的很少：

我覺得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你要把自己當做一張白紙，你要試著去學習。我有認識台灣人就是不吃食堂，因為他覺得很髒，他不願意跟大陸人在一起。那我就會說好呀，一頓飯3毛5毛的，我就跟著去，不吃什麼也沒關係。所以到最後，

他們的好朋友就是香港人、澳門人，就是不跟大陸人在一起，那你就去香港念書呀，不要來這裡。到這，人家髒你就跟著一起髒，跟著他們一起生活。像住宿舍也一樣，一定要有這個階段，要到讓大陸人把你看成自己人，才能達到你來的目的。

仕威在飲食、居住、交友活動、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刻意地採取「同化」的策略，透過洗去台灣人的習慣（把自己當成「白紙一張」），以積極融入本地學生之中。他認為唯有做到如此，透過「交流交心」得到在地知識，並累積「把我當自己人」的在地人脈關係，才能獲得「真正的中國經驗」。仕威也特別重視和導師之間的人脈經營，因此博得老師的協助，介紹他進入當地的公家機構工作，這在台生之間，是很少有的際遇。

仕威也強調語言上的畫界策略，他隨著互動對象和情境會調整、改變自己的腔調、用語，在當地人面前，他學好捲舌音（他特別強調「不要每個音都捲」），好讓「大陸人很少聽得出來我是台灣人」。他也刻意記下本地人的用語習慣，為的是讓他們「慢慢看到你就覺得跟他們一樣」。

像我現在都會講，「這咁整啊？」就是這怎麼用。像手機不好用，「這不好使」。很多啦，或者說，這個「傻B十七八蛋」、「很牛啊」。像東北，這飲料很好喝是吧，「這老好喝」，講更低俗就「賊好喝啦」。慢慢看到你，他們就覺得跟他們一樣。他們慢慢就會覺得你在融入，讓他們慢慢會覺得你跟他們一樣。就交流了很多。這樣你也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像我才在跟我師姐聊，像是「又紅又磚」，¹⁷她說，欸，你連「又紅又磚」也會了。

17 仕威高興地向我們解釋「又紅又磚就是老黨棍，很共產黨。」但其實正確寫法是「又紅又專」。

適時表態政治立場以及展演國族認同，更是重要的求同策略之一。仕威描述自己宣示反台獨的「選邊站」策略，藉由表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立場，以取得「自己人」的當地認同：

他們是真的很反台獨，非常反台獨。但是我發現當你跟他說你也反台獨，那他們就會馬上講，那你是自己人……我這麼說無關統獨，只是說你來北京讀書，你就把自己當中國人，就算你是獨立分子，你也不必這樣[噲]。因為這裡的氛圍絕大多數就是反台獨，但是大家都同意是中國人，所以我還是表現的很大中國。

此外，他也努力看當地的電視節目，並學習當地的政治制度等各項知識，以便在談話過程中，表現得「比中國人更中國」：

我盡量做到在跟你談話聊天，談中國的政治、中國的體制、要選各省省長、各直轄市市長，我都可以談。就像我在台灣談馬英九、陳水扁一樣，讓他們覺得我好像很懂一樣，他們不會懷疑我不是……我一定要做到這樣，甚至我要做到讓他們認為我比他們更中國。就像到美國一樣，你要讓他們覺得你對美國歷史很瞭解。可以跟美國人談論甚至是政治笑話。也許他們會把你當美國人。我知道這很難，真的很難。

值得注意的是，仕威用了美國的類比，來描述自己對於中國的認同。在交往對象上，他也強調自己仍然「愛用國貨」，不喜歡與本地女性交往。這顯示出他的求同策略行動，背後肯認了兩岸差異的存在。一個台灣人要在美國「矇混過關」(passing)為當地人比較困難，而基於母語與外貌的近似，比較可能成功矇混當中國人。仕威在目前工作的公家機關，如非必要，他不讓人知道台灣人的身分。透過上述語言、生活、政治等方面的求同展演，他企圖矇混過關，低調避免台

灣人身分帶給他的可能負面影響，如不信任、他者化；或者，利用文化與族群的親近性，來建立社會連結。如他所言：「不妨利用同文同種這個優點，盡量做到讓大陸學生可以跟你談心、談政治、談未來，這樣你才能說我來大陸我融入這裡。」這樣的求同策略，是高度工作目標與實用主義導向的，爲了以中國市場爲目標的事業發展，努力尋求社會與文化的認同，甚至展演外顯的政治立場認同。

最後，與當地人發展親密關係等偶遇因素，也可能非預期地引導台生未來的遷移軌跡，以及逐步形塑了日常生活中的求同策略，Lisa 便是這樣的例子。她的祖父母都是戰後播遷來台的外省人，公務員背景的父母原本支持她去美國念碩士，但因爲種種機緣而前往廣東求學，並在當地結識了來自北方省分的男友。

Lisa 畢業後決定留在廣東工作，最關鍵的因素在於，基於台灣政府對中國配偶與移民的特殊化管制，她擔心男友在台灣不容易取得居留與工作。她在訪談中娓娓道出：「我那時候不可能回台灣……[訪談者：爲什麼？]因爲～因爲回台灣怕就是……可能跟我男朋友很難繼續下去。」Lisa 不僅擔心男友來台灣會受到歧視，也與不太贊成這段關係的母親談條件，如果母親希望她回來台灣，就要答應他們兩人結婚。

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Lisa 畢業後留在當地找工作，她不像許多台生偏好進入當地台商企業工作，反而選擇陸資公司。她在就學期間曾經在台資企業打工，彼時身爲台灣人薪水就高於當地人一階，以及被當地員工標籤爲與資方一國，這些「台灣人特權」經驗讓她感覺很不好。因此，畢業後她傾向以「求同」的方式來找工作：「我像他們當地的一樣方法去找，我沒有特別找台商的公司，因爲我覺得，就我前一份工作給我的感覺就是～嗯～我不想待在台灣公司，然後～嗯～我也不是太想……就是說一定要工資比別人高很多」。

Lisa 也討厭當地人因爲發現她的台灣人身分而衍生一種「生疏的客氣」的態度。因此，爲了不被標籤爲台灣人，造成人際關係交往上的限制，Lisa 很刻意地修改自己的台灣口音，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模仿

身邊北方朋友的口音：「有的時候人家會跟我說，耶，妳那聲音一聽就是台灣人的聲音，那我就會繼續問他們說，那什麼樣是台灣人的聲音，他們會跟我說，然後說了我就會改掉」。Lisa 的居留軌跡以及求同畫界策略，並非刻意經營的策略或工具理性的選擇，而是基於個人生命偶遇的推移，在制度框架的機會空間中，磨合出最符合其情感利益的生存之道。

（三）留在中國發展但求異畫界

大多數台生的畫界策略屬於第三個類別，也就是既想留在當地發展，又強調與當地人群區別的一種弔詭樣態。其中比較明顯的群體包括「聚落台商子女型」、走國際教育路線的「專業移民子女型」，以及「跨區流動型」。

如何留在當地，同時又求異？地理與社會空間上的區隔是一個最主要的實作策略。由於族裔經濟的集中性，聚落台商子女的生活型態與活動空間，都與本地學生有明顯的區隔。多數台商家庭都選擇住在台商為主的社區，除了家裡的幫傭與司機，在日常活動上和本地人群沒有太多接觸。如台商子女小安，自承出入都搭家裡的房車，因為覺得「外面很危險」。因為怕買到「黑心食品」，她從沒去過當地菜市場或商店買東西，而是定期到鄰近的外國連鎖超市消費。她受到父母小心的保護，也很少結交當地的朋友。

在教育過程中，台商子女也經常採取空間區隔的策略。大學前的階段，許多台商子女就讀的是台商學校，即便進入當地大學就讀後，仍有一些學校，例如有「華僑大學」之名的暨南大學，採取港澳台生和本地生分開上課活動，也就是所謂「外招生」和「內招生」分班的制度。在學校生活中，他們能與本地同齡學生接觸的機會不一定很多，他們主觀與當地人接觸的動機也不強烈。

相對於過往台商在當地經濟與社會中鞏固的階級優勢，許多台生或家長隱微地表達了對於旅中台灣人處境「每況愈下」的焦慮，以及對於本地人踰越（地理的與社會的）界線的恐慌。例如，在一次廣州

的訪問中，我們接觸到一位台商家長，其子女在當地念台商學校高中部。他們住在一個有專屬巴士接送的門禁社區，但這位母親煩惱地提及，香港人因為物價上漲而搬離此社區，有錢但素質差的本地人開始入住，這讓她很不安。這位母親對於小孩在中國的成長與教育也感到憂心，表示不願意讓小孩留在大陸念大學，覺得「留在這裡念書可能有問題」。她憂心忡忡地說：「將來小孩子弄不好就變成台流」。

前面提到，許多「專業移民子女」對自己的認同其實接近「住在中國的世界人」，哪裡都不像自己的「家」。例如，曉晰的父母應聘到中國的服務產業工作，舉家遷移北京後，曉晰上的是昂貴的國際學校，到了大學才有機會與當地同學相處。曉晰的父母希望她大學畢業後就出國，到歐美念研究所。生活圈子以台灣、外國朋友為主的她，剖析自己「像是沒有自己的根」的處境：「在這裡我說我是台灣人，但其實我每次回去[台灣]都不知道要去哪裡，沒有人帶我去，也不知道怎麼去。……因為在那邊房子已經賣掉了，我們沒有自己的家，回去就好像寄人籬下」。

曉晰的例子呈現了很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長大的專業移民子女的處境。這些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充裕的父母，往往期待子女能夠複製其專業遷移的路徑，為下一代規劃取得「國外學位」的資本積累方式，以保持跨區域流動的彈性。他們傾向讓子女在中國就讀國際學校，擔心本地學校的教育方式會侷限子女的學習與發展。國小時隨父親工作而舉家遷移北京的高高，先是就讀本地學校，後來在父母安排下轉念昂貴的國際學校，他說：「我爸認為再跟內地生讀下去就讀傻了。他就是覺得越來越 localized，就是感覺我的一些想法什麼、讀書方面太 local，他不喜歡，他後來就想算了，還是把你丟到外國學校去。」安排子女就讀國際學校，可以說是教育安排上的一種「求異」策略。連帶的影響是形成小孩與當地社會在地理和社會空間的區隔，子女少有機會深入接觸當地人，在思維模式與認同上也容易保持「格格不入」的狀態。

同樣採取留而求異的畫界策略的另一個主要類型，是以外資企業

為工作目標的「跨區流動型」台生。他們對於「崛起的中國」、「國際化的中國」有很高的期待與嚮往，但清楚地和「落後的中國」、「當地人的中國」區隔開來。

M小姐在到北京念商科碩士之前，已有美國商學院學位和豐富的台灣工作經驗。來中國念書是她精心規劃的職業生涯中的一個人力資本積累策略。希冀透過中國名校學位，讓沒有本地經驗和人脈關係的她，得以進入大都市中的外商企業，以便於後續的跨區流動。M小姐夾雜著英文單字，以「國際化、向上流動的中國 vs. 停滯的台灣」來解釋她遷移的主要動機：

我本來就覺得中國很多機會嘛，來之後我覺得算 confirm（確認）這個東西，我覺得沒有錯，這邊的確是可以發展，而且這裡比台灣國際化。當地人是不怎麼國際化啦，可是這裡的外來人很多。台灣其實就已經停了，我覺得。這裡就是它一直在往上，你不知道它會到什麼時候，當然，我現在講的都不是 local（當地人），都是外國人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其實都是很好的，然後生活起來也很舒服……然後很多外來的訊息呀，很多國外的公司都在這邊設很多的 office（辦公室），所以妳如果要找人聊，妳要認識一些人的話，其實也不難，這邊的國際化的人比較多。

在台灣經商的父母，起初不贊成M小姐移居中國，認為中國「很危險、很容易被欺騙」。然而，這樣的立場與政治認同沒有明顯的關聯，M小姐描述自己和家人的政治立場是：「看誰可以讓我們賺錢就好，很現實的家庭啦。」M小姐雖然不顧家人反對前往中國，但也不諱言指出她對學校教育、同儕態度以及當地生活方式的不滿：

空氣很差啊、交通很差啊，人的素質也很差，到處都是在隨地撒尿的人，每天都有啊。然後講話大聲、服務態度不好，

要個東西可能要三百次都不會來，這都很正常，都習慣了。可是我現在漸漸來久了，我大概知道說我要去哪裡，我出來看到的人都是比較……我覺得比較有水準的人，我去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利用選擇式的方式，把一些我不想要看到的東西就盡量不要看到……像我住的這區，都是外國超市啊、外國咖啡廳、外國餐廳，妳要國外的 cheese、紅酒啊，都有，都沒有問題，當然貴一點是一定的。

類似於台商子女，在居住與活動空間上，M小姐也有意識地採取區隔的策略，她希望避免看到「她不想看到的中國」，而選擇住在比較昂貴，但生活型態與商品服務，都以外國人（更具體地說，西方人）為主要對象的小區。在親密關係的交往對象上，她也偏好與外國男性交往，而非當地人或是台灣人。這樣類型的台生，在求學與畢業時，多有意識地選擇上海或北京等全球城市為遷移地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遷移經驗是超級流動(hyper-mobile)、無根無憑的。如同曾熾芬(Tseng 2011)所強調，除了最高階的少數人，多數專業移民仍須與遷移的城市建立一定的經濟與文化的連結。在上述「專業移民子女」與「跨區流動型」台生的個案中，我們看到他們企圖以「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策略來劃分自己與「當地人的中國」的界線，但同時，他們仍須積極建立與所居城市中特定市場部門與人群社區的在地關聯。

最後，當初不論是基於學位或工作的目的而前往中國求學，許多台生後來因為工作機會或學歷認證等偶遇因素，進入本地就業市場或兩岸經貿空間中工作。例如，阿霖在台灣念了一年技術學院後，決定到廣州學中醫，外省家庭、軍人背景的父親也欣然同意。原本期待學歷認證問題可以隨著「政治變藍天」而獲得解決，但即將畢業的他，眼看制度條件仍未改變，已開始考慮留在當地工作。雖然中國醫師的薪水很低，但他說服自己：「如果說放長遠一點看的話，在這邊，你現在能卡位其實還是有機會的。」雖然阿霖是 1980 年後出生的世代，

他的小學作文還曾經從「美麗的一朵花」寫到「反攻大陸」的結論。面對當地同學促統一、反台獨的言論，他多半閃躲迴避，而掩飾他心裡對兩岸關係的想法：

我自己認為就是，反正現在這樣就好了，就是不要打仗。然後可以像香港那樣，個別獨立一個行政區，或者是我們維持現狀。如果說以後真的被同化，我希望就是……台灣還是台灣那一塊就好了，我們不要太多干擾這樣子。

這些台生雖然選擇居留，遷移的經驗卻讓他們反思性地體認其主體位置，進而衍生以求異的策略來標示中國人與台灣人的界線。以小莉來說，前面提到她懷抱著對中國的好奇前去攻讀商科碩士，自承過去在台灣時政治立場偏統、偏藍。小莉的祖父、外公都是 1949 年從中國流離來台，但對於她這樣的「外省人第三代」來說，大陸並沒有「家鄉」的懷舊色彩。當訪談中間到在中國是否還有親戚時，小莉回應有姑姑從台灣到中國工作，再次詢問是「老家」的親戚，她才恍然大悟地說：「沒有回去過，不認識。」小莉在畢業後很幸運地進入當地一家外資企業工作。這位當初見到長江興奮不已的小姐，在北京居住三年後，對於「崛起的中國」逐步發展出不同的感受。在訪談中，我們聊到剛結束的北京奧運，小莉說她並沒有分享和當地人一樣的「感動」，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

小莉：我會覺得了不起，有這麼大的排場，中國共產黨真的是了不起。但那就是你家的事……我去了之後才覺得，台灣才是我家。我以前覺得一定會統一啊，現在到這邊就說，台灣一定要堅守最後一塊淨地，真的！我會支持台獨。

訪問者：你的經驗反而是一個轉變。

小莉：對。

訪問者：你之前並沒有這樣想？

小莉：我以前會覺得，啊你們搞台獨的是不是瘋子啊。其實大家兩岸就是統一的啊，可是我到那邊以後也不一定就會支持台獨，只是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很獨立的地方。內心會覺得希望台灣能夠維持這種主權獨立的狀態，但是現實怎麼樣那就真的沒辦法想，如果有機會的話希望還是保持獨立比較好一點。

雖然對於中國的規模經濟與國族展演感到印象深刻，但小莉清楚地將其標記為「你家的事」。對她來說，在中國的遷移與居住經驗，反而如同一面鏡子，清楚地映現他者與我群之間的差異，讓她對於統獨與國族認同衍生不同的想法。她描述有一次和當地好友坐下來暢談政治和人權的議題，但嘗試一次之後，她的感想是「再也不說了，太恐怖了，他們真的不懂」：

我跟他講台灣人真正的想法，他聽了之後嚇到。其實台灣人跟大陸人還是有差的，我們會覺得政治是自己的事情，他們會覺得政治就是官的事情……我只能跟他們講，我們的現況是這樣，我們不能接受被大陸統治，我覺得我們想獨立是因為一旦被統一之後，我們覺得我們就會失去這份自由。但是他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很自由了，他們覺得他們也在罵政府啊。他們那種認知跟我們的認知根本是不一樣的，所以跟他們講他們聽不懂。

跟小莉有類似感受與表達的台生有好幾位，尤其是外省家庭背景的子代更為明顯。有人坦承：「我以前在台灣，我沒有感覺到我是台灣人。」在台灣的族群政治脈絡中，這些外省後代定位自己是「中國人」，有別於福佬與客家族群；移居中國後，卻在與當地人區辨下轉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顯示認同不是本質性的範疇，而是在人群互動與界線劃分過程中的歷史產物。也有幾位台生提到自己在台灣

的時候不會說台語，反而是到了中國以後才開始學，為的是在當地用台語和台灣同學交談，可以用語言築起一道圍牆，讓當地人聽不懂他們的談話與抱怨。語言成爲我群與他群在社會互動的區隔媒介，以及我群認同的標示(marker)。去上海念中醫、政治立場偏藍的阿杰，雖然要盡量掩飾原本台灣的口音與說話方式，但也希望避免自己「本土化、內地化太過嚴重」，不時提醒自己：「如果不小心講成那樣，要把它改回來」。

隨著遷移時間的延長，這些台生在日常生活的文化接觸中，回頭檢視教科書中陳舊的、虛幻的中國，或反思媒體炒作下眩目的、片面的中國，重新形構了自己的國家與國族認同。如小武生動地描述：「再怎麼藍的人，去了大陸後都會開始出現綠光。因爲你去了以後，你會很明顯感覺到，你會問自己我要跟這些人同一個國家嗎？然後答案都是NO。」旅中台生以特殊的學生身分「獲邀」去體驗「祖國」，但在國族認同、身分指認等微觀政治上，卻可能產生制度非預期的「認同的再疆域化」後果。

九、結論

本文以旅中台生的個案作爲切片，探究旅中台灣人的遷移經驗，如何影響其國族認同的形構與轉變。遷移是一個文化接觸的沃壤，也是一個中介過渡的處境。生活在中國的台生，既被視爲流離的國族和家人，又常感受到因台灣人身分而被視爲他者，更明顯地處於「中介之闕」的曖昧矛盾位置。¹⁸ 本文以畫界工作的理論概念，剖析台生如何在互動情境中，不僅指認出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同或異，也透過

18 另一個與台生類似的學生遷移個案是前來台灣就學的華裔僑生，本文限於篇幅無法進行詳細的討論，請參見吳伊凡(2010)有關旅中台生與旅台馬來西亞僑生的比較。簡言之，由於華裔僑生在母國面對更異質的種族政治，與台灣人互動時衍生的畫界工作策略，一方面要以「馬來西亞人」（國籍）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和「馬來人」（種族）區辨開來。這兩個個案在遷移軌跡上也有明顯差異，基於台灣政府目前的國族論述與國境管控制度，畢業後的僑生按照「外國人」就業的規定，很難有機會取得工作居留，與台生在中國被視爲「準國民」的待遇不同。

各種日常實作模糊或強化界線。我們發現三種主要類型的畫界工作策略：(1)傾向畢業後不留在中國工作，同時也傾向強調台灣人與當地人之間的根本差異；(2)傾向畢業後留在中國，並積極尋求融入當地社會與人群；(3)最多數的人希望留在當地工作，但在地理空間與社會生活中，都維持與本地人之間明確的界線與區隔。在此，我們進一步解釋有那些因素形塑了畫界工作策略的差異分布。

移民個人或家庭的遷移軌跡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畢業後預期留在中國工作者，必須以「移民」或「跨國民」的角度，來磋商兩岸人群之間的界線；計畫學成後離開中國（返回台灣或移往他國），也就是學位導向的台生，則容易維持「暫居者」的身分與態度、採取第一類的畫界工作策略。必須注意的是，留與不留的決定，往往在遷移過程中衍生變化，或受到制度環境所牽動，例如台灣政府是否承認中國學歷、中國政府是否對台灣人開放特定職業證照或實習機會，以及兩岸就業市場的景氣程度。此外，個人的偶遇因素，尤其是與當地人交往的親密關係，都是影響遷移軌跡的變數。因此，學位導向的台生，也可能在後期轉向其他類型的畫界策略。

畢業後預期居留的台生，傾向類型二或類型三的畫界工作策略，與他們在遷移過程中被納入在地社會的模式(modes of incorporation)有密切相關，其中包括：一、納入在地勞動市場部門的差異：以在地市場為就業目標或創業者（在地耕耘型），較傾向求同；期望進入外資企業（跨區流動型）或台商企業工作者（兩岸通商型），則傾向求異。二、納入本地社區的差異：居住在封閉性較高的台灣人社區，常見於珠三角地區（聚落台商子女），傾向維持求異的畫界策略；在大都市中與當地人混住，或是求學時住在當地宿舍者，較傾向朝求同的畫界策略移動。三、納入本地教育體系的程度：在隨父母遷移的台生中，在大學前的教育階段，進入台商學校或是國際學校就讀者，傾向維持求異的畫界策略；進入本地學校就讀者，則傾向朝求同的畫界策略移動。

至於遷移時間的長短，對於其認同形構與畫界策略的影響，我們

認為只具有有限的解釋力。固然，隨著父母遷移，在大學前就已經前來中國的台商或台幹子女，相較於一般台生，與當地社會有更長期的接觸。然而，如果他們納入當地社區或教育系統的模式是隔離型的，如台商聚落與台商學校，其「留下而求異」的傾向，並不會隨著遷移時間的拉長而有明顯變化。

台生的族群身分，對其遷移軌跡的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受訪者中有兩成具有外省家庭背景，這些「外省第三代」雖多未懷抱「返鄉」的心情前去中國，但其父母傾向贊成子女到中國讀書的決定。然則，我們的研究也發現，族群身分對於台生的認同形構或畫界策略沒有必然的影響。外省家庭背景的受訪者中，固然有「求同」者，也有相當比例「求異」；他們的遷移經驗對於其國族認同的轉變反而更為明顯。先前研究已經指出，省籍身分對於國族認同的影響日益衰退，容易接受新的政治認知的年輕世代尤為如此（徐永明、范雲 2001）。本文的部分受訪者坦承，在台灣時未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因為此範疇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中所指涉的歷史經驗與文化元素（如台語），讓他們感到被排除。遷移中國的人群互動經驗，提供了新的參照對象，為了區辨當地人作為「他者」，反而讓他們回過頭來指認自己是「台灣人」。

本文的理論貢獻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首先，我們介入遷移文獻中的辯論，反對將「同化」或「跨國狀態」視為移民的普遍生活樣態。遷移的中介經驗，不必然線性地進入同化、納入主流社會的階段，然而，長期的跨國狀態也未必適合用來描述所有移民的狀況。我們進而提出座標圖的分析工具，探討移民群體內部的異質經驗，並且用畫界工作的概念來分析移民的日常磋商與行動策略。本文提出的座標圖可以適用於分析其他類型移民；我們認為，此分析工具有以下的優點與理論意義：第一，我們用光譜，而不是範疇或類型，來看待遷移軌跡與認同的異質分布，強調這些範疇之間的界線不是絕對區隔而是相對區分；第二，光譜的連續體分布也指涉時間性的變化，呈現遷移軌跡或認同形構都有著與時變化的性質；第三，我們用兩個光譜為

座標架構出一個場域（社會空間），來分析移民內部的異質性，換句話說，移民主體如何因應「留與不留」、「同與不同」這兩個問題主軸，來磋商自己的定位與未來。

其次，本文從兩個層次來分析移民的認同形構，第一，認同是在論述召喚以及主體敘事的雙重過程中縫合(suture)而成，第二，指認差異與劃分界線的過程，體現在食衣住行、語言、空間、社會交往等日常生活人群互動的各個層面。這樣的分析，凸顯認同不是本質性的給定範疇，但我們也反對工具論式的認同觀點。固然，有些移民基於工具利益的考量，如希望留在中國工作與發展，有意識地進行特定的認同展演。然而，我們的分析框架強調的是，探究移民認同形構時，必須分析具體而不同的遷移軌跡所產生的路徑依賴效果，不論是外在的制度空間，或是遷移過程中的納入模式，如何形塑一定的理念、情感與利益空間，既給予也限制了鑲嵌其中的移民的能動性。移民的「留與不留」，往往不是意向明確的預先計畫，而是「邊走邊看」、「因勢而移」，充滿偶遇、隨變的可能。認同形構則是此過程中持續演變、逐步磋商的累積後果。

崛起的中國，以其浩瀚市場優勢，吸引了數量日增的台灣人前往工作與創業；在國族主義的旗幟下，中國政府更提供優惠的居留與招生政策，來便利旅中台灣人的就學與居留。然而，上述的「國民化待遇」的制度，卻可能在微觀認同上產生「重新區辨台灣和中國」的非預期後果。在中國生活的遷移經驗，提供了不同的空間場景、推移的時間框架，以及關係性的他者對照，讓旅中台灣人反思性地指認與畫界，結果，他們不僅「重新認識了一個新的中國」，也不斷校正定位「我們是誰」的主體位置。

誌謝：本文為「臺灣學生至中國的遷移」(2008-2010)兩年期研究計畫成果，經費由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補助，藍佩嘉為計畫主持人，吳伊凡為計畫研究助理。我們感謝《台灣社會學》的兩位匿名評審、編委會以及蕭阿勤的修改建議。吳伊凡曾利用此計畫部分資料撰寫碩士論文（吳伊凡2010），在此一併感謝碩士論文兩位口試委員——曾熾芬與汪宏倫——的指正。

參考文獻

- 天下雜誌(2009)國情調查。437: 63。
- 吳乃德(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衆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9(2):5-39
- 吳伊凡(2010)再疆域化的學生遷移：旅中台生與旅台馬生的比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伊凡、藍佩嘉(2011)去中國留學：旅中台生的制度框架與遷移軌跡。投稿審查中。
- 林平(2010)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中國高校的學歷。台灣新社會智庫網站，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609&Itemid=117
- 汪宏倫(2001)制度脈絡、外部因素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 1: 183-239。
- 徐永明、范雲(2001)「學作」台灣人：政治學習與台灣認同的變遷軌跡，1986-1996。台灣政治學刊 5: 3-63。
- 陳思豪(2011)民調：兩岸越好，我是台灣人認同越高。聯合報 3月9日。
- 張冬冬(2011)大陸高校在冊港澳台僑學生超過兩萬六千人。中國新聞網 2011年6月23日。<http://www.chinanews.com/hwjy/2011/06-23/3133405.shtml>
- 曾熾芬、吳介民(2010)重新思考公民身分的政治面向：移居中國之台灣人公民身分政策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32: 93-143。
- 鄧建邦(2002)接近的距離：中國大陸台資廠的核心大陸員工與台商。台灣社會學 3: 211-251。
- (2009)跨界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見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台灣的跨國，跨國的台灣，頁 133-160。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附錄二。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
- 聶傳清(2005)大陸歡迎台灣學生前來求學深造，設立 700 萬元台灣學生獎學金。人民日報海外版 8月25日。
-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 1-47.
-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laeser, Andreas (2000) *Divided in Unity: Identity, Germany and the Berlin Pol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l, Stuart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Pp. 1-17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 Huang, Shu-Ling (2010) *Re-Mediating Identities in the Imagined Homeland: Taiwanese Migrants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Philip Merrill College of Journalism.
- Nippert-Eng, Christena (1996) *Home and Work: Negotiating Boundaries through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2003) Conclusion: Theoretical Convergenc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Study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 874-892.
- Schiller, Nina Glick,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1995) 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8 (1): 48-63.
- Shen, Hsiu-Hua (2005) 'The First Taiwanese Wives' and 'the Chinese Mistresse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Familial and Intimat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Global Networks* 5(4): 419-437.
-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Pp. 37-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Blackwell.
- Thomassen, Bjorn (2009) The Uses and Meanings of Limina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thropology* 2(1): 5-27.
- Tseng, Yen-Fen (2005) Permanently Temporary: Taiwanese Business "Nomads" as Reluctant Migrants. Pp. 179-193 in *Asian Migrations: Sojourning, Displacement, Homecoming and Other Travels*, edited by Beatriz P. Lorente, Nicola Piper, Hsiu-Hua Shen and Brenda S. A. Yeoh.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2011) Shanghai Rush: Skilled Migrants in a Fantasy C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5): 765-784.
- Tsuda, Takeyuki (Gaku) (2000) Acting Brazilian in Japan: Ethnic Resistance among Return Migrants. *Ethnology* 39(1): 55-71.
- Waldinger, Roger (2008) Between "Here" and "There": Immigrant Cross-Border Activities and Loyalt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2: 3-29.
- Waldinger, Roger, and David Fitzgerald (2004) Transnationalism in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1177-1195.

Wang, Horng-Luen (2009) How Are Taiwanese Shanghaied.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7(2): 321-346.

Wimmer, Andreas,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2002)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 *Global Networks* 2 (4): 301-334.

Yeoh, Brenda. S. A., and Katie Willis (2005) Singaporean and British Trans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ntact Zon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1(2): 269-285.